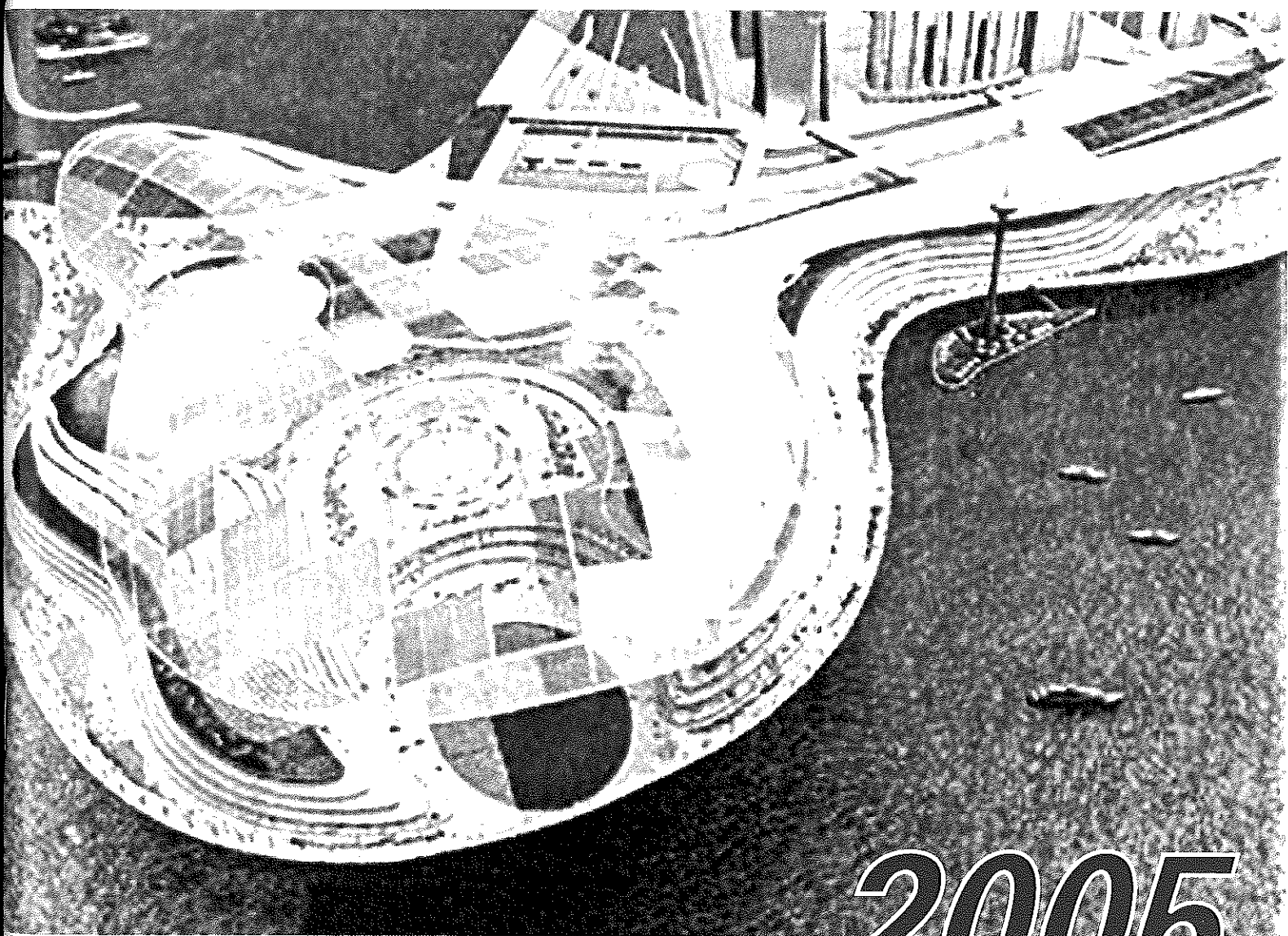


當代港澳

STUDIES ON HONG KONG & MACAO



2005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出版

第2期

当代港澳
2005 年第 2 期
(总第 25 期)

目 录

本刊顾问:

许锡挥 郑佩玉

主 编:

陈广汉 周运源

副 主 编:

陈丽君

袁持平

郭天武

主办单位: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

三角洲研究中心

电 话:

(020) 84113279

E-mail:

puhkmac@zsu.edu.cn

邮政编码:

510275

登记证号:

粤 O 第 1105 号

刊 期:

逢 6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出版

本期出版日期:

2005 年 12 月 15 日

特 稿

论港澳与中国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演进 陈广汉 (1)

提高澳门公共决策水平, 应对未来的挑战和发展
..... 刘伯龙 (10)

政 治 与 社 会

继往开来 探索无止境

——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 20 周年偶感 周运源 (14)

香港遭受恐怖袭击可能性分析 言 军 (17)

建立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动物防疫体系 黄 瑤 邢益强 (20)

歌声中的合作与交融

——粤港合作演出《中国抗战声乐史诗——不屈的中华》

有感 王家瑾 (24)

经 济 与 法 律

港珠澳大桥与中深大桥建设的必要性与功能互补性

..... 郑天祥 (28)

香港“产业空心化”与“积极有限干预政策”

..... 阮北平 危应华 (30)

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周余辉 (36)

论群防群治在珠三角犯罪治理中的作用

..... 黄 琪 郭天武 (41)

学术动态 (48)

本刊声明

- 本刊所发表署名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
- 本刊所刊登的图文均保留版权, 请勿擅自转用。

论港澳与中国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和演进^①

陈广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香港在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成为引领中国内地经济走向世界和世界经济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凭借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社会文化相通的人文优势, 开启了与港澳的经济合作过程, 形成了在制造业领域、以优势互补为基础“前店后厂”式跨境一体化生产与服务的综合经济体系。港澳与珠三角之间“前店后厂”合作模式的形成, 导致三地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流动和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 成为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雏形和基础。这种以市场为基础, 以比较优势为原则, 以国际市场导向为特征的区域内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而且使香港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转变成为国际金融和商贸服务中心。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其密切的经济联系、强盛经济活力和

持续的经济增长, 被称之为中国的“金三角经济区”。

世纪之交发生的影响中国发展的两个重要事件——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与中国加入 WTO, 也将深远地影响香港和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港澳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从理论变为实践, 成为影响港澳与内地经贸关系的重要政治因素; 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局部开放走向全方位开放, 成为影响港澳与内地经贸合作关系的经济因素。正是在这种新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 中央政府与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分别于 2003 年 6 月 29 日和 10 月 17 日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 CEPA), 成为构建新时期港澳与内地经贸关系的制度性安排。它将推动港澳与内地的经贸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也必将发生新的变化。

^① 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特别委托项目成果《新世纪的“前店后厂”——粤港澳经济关系走向研究》一书的“序论”, 该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市场开放程度与比较优势： 决定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的两大经济因素。

回顾香港与中国内地经贸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内地的市场开放程度和香港与内地的比较优势是影响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的两个基本的经济因素。根据中国内地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中国内地市场基本封闭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香港作为中国重要对外贸易转口港的地位在 19 世纪末已经形成。在这一时期，经香港进口的货值占中国进口总值的比重曾一度高达 55% 左右，而出口值则达到 40% 左右。^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发展思路的偏差使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基本上只能同前苏联为首、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有限的以货易货的贸易。在这一时期香港几乎成为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联系的唯一通道，香港作为中国内地转口港的地位日渐下降。香港凭借自由港的地位、国际性的商贸网络和与中国内地特殊联系，承担了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之间有限的贸易转口港的作用。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27.2%，不断下降到 1970 年的 8.8%。这一比例在 1980 年以后，开始明显上升。尽管如此，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内地一直在香港贸易总额中保持前 4 名的地位，大多数年份位于前 3 名；而在进口方面则保持在前 1-2 名的位置。^② 第二时期，中国内地市场的局

部开放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这一时期从中国内地实现改革开放开始到中国加入 WTO 和 CEPA 签署为止。1978 年中国采取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内地的市场开放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渐进式、局部开放的道路。这种局部对外开放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从地域来看，首先是从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其中三个放在广东、两个位于珠三角，紧邻港澳地区。从领域看，首先是直接投资市场的开放。在大力引进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为了有利于国内本土工业的发展，对国内市场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产业的产品内销市场实现了比较严格的限制。这是导致粤港之间“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的一种投资与贸易的制度安排。“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的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投资和贸易是互动的，正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发挥到了极致，香港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前店后厂”合作模式是香港的体制、资金和它掌握的国际市场与内地和珠三角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在中国内地市场局部开放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内地在香港外来直接投资和香港向外直接投资中均名列首位，2001 年底中国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头寸为 9581 亿港元，香港对内地的

① 参见甘长求：《香港对外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2-13 页。

② 参见华润贸易咨询有限公司：《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1947-1987），第 53 页。

直接投资的年底头寸为 8440 亿港元。^① 42002 年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 42%，香港转口贸易的 90% 与中国内地有关。同时，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贸易也占中国内地贸易总量的 11.2%，香港成为中国内地第三大贸易伙伴。^② 第三时期，中国内地市场全方位开放时期。以中国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内地市场进入了全面开放时期。珠三角地区经过近 20 年的高速增长，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中国内地市场的全面开放和粤港澳之间比较优势的变化，导致了 CEPA 的产生，影响着“前店后厂”模式的发展方向。最大限度的降低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建立起开放和统一的市场，实现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成为新时期港澳与内地以及粤港澳合作的主要内容。为此，我们需要在体制、基础设施、产业分工等方面建构起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框架。

二、制造业基地与服务业中心： 粤港经贸合作的两大成果

粤港澳之间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推动了珠三角世界性制造业基地和香港国际性服务中心的形成。

1、珠三角：世界性制造业基地的崛起。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内地第二大三角洲。她北起广州，呈扇形向东南和西南放射，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区、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等 13 个市、县组成，其土地面积 41698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总数 2398.63 万人。^③ 改革开放以前，珠江三角

洲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山丘散布、土地肥沃、河道纵横、阳光充沛，是最适应农业生产的地方。勤劳的三角洲人民将这里建设成为全国著名的“鱼米之乡”、“桑蚕之乡”、“蔗糖之乡”和“果蔬花木之乡”。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珠江三角洲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使她日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和经济发展奇迹。20 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珠三角却摇身一变从农业社会的“鱼米之乡”成为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走过了发达国家用近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发展之路。

1980 年——2003 年，以当时价格计算珠江三角洲的 GDP 总量由 133.25 亿元增加到 11341.13 亿元，人均 GDP 由 786.36 元增加到 39782 元，平均每年分别增长 21.3% 和 18.6%。同期，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大幅下降，从 25.1% 下降到 4.15%，下降了 20.95 个百分点；从 1980 年到 1994 年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二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上升了 15%，达到 50.2%；随后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从 28.61% 上升到 43.47%，在 2003 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基本持平。1980 年 2003 年，珠江三角洲的财政收入由 24.32 亿元增加到了 848.03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16.7%。同期，对外贸易增长更为迅速，出口总额由 129.28 亿美元增加到 1450.56 亿美元，年均增长 11.08%。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 1992 年到 2002 年十

① 《香港统计年刊 2003 年版》，第 387—388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② 吴光正：“CEPA 揭开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新页”，《香港经济年鉴 2004 年》，香港经济导报社，2004 年 10 月，第 13 页。

③ 数据来源：2004 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年间,农村居民纯收入由 1722.31 元提高到 5564.80 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 1940.43 元增加到 12241.93 元。2003 年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8239.39 元,收入的增长带来了消费结构的变化,其中花在食品上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3004.19 元,珠三角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 36.46%,已进入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定的富裕区。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珠三角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由 1996 年的 6022 间增长到 2003 年的 6467 间,增幅为 7.4%,普通中学数量由 1996 年的 1450 间增加到 2003 年的 1640 间,增幅达到 13.1%。

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的结果。珠三角地区能在 20 多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骄人的经济发展成就得益于制造业崛起推动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与承接港澳地区的制造业的转移密切相关。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 and 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优势,把握港澳和东亚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从而迅速崛起。在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外来直接投资中,港澳资本捷足先登,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动效应。港资的流入在初期形成了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加工贸易模式,香港主要的制造业大约 80% 以上的工厂或加工工序转移到了广东,其中转移到珠三角的占 94%,这一迁移催生了珠江东岸地区加工工业的高速发展。港资启动了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创造了众多间接经济效益,比如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珠三角的外溢效应,珠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珠三角人们社会观念的转变。截至 2003 年 8 月广东引进海外直接投资 1200 多亿美元,其中 68.8% 来自香港。

外向型和集群式发展是珠三角制造业发展的

两大特征。珠江三角洲特别是珠三角东岸的制造业是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通过直接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发展起来的。与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相比,它是后发性的经济成功地利用后发优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模式。开放经济条件下工业化模式,不仅克服了传统进口替代工业化可能产生的外汇和市场的约束,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收支困难,而且为发展中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开拓了国际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模式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这些制造业的产业链在本土的延伸和研究与开发的本土化。这种制造业的产业本土化和研发本土化趋势在珠三角已经开始。同时,珠三角西岸地区的制造业发展却遵循着“进口替代——出口鼓励”的模式。例如,顺德、中山等地的家电产业最初就是依靠本地资本、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并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当这些产业的国内市场出现饱和状态时,它们迅速地进入国际市场,成功地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在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珠三角还是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最早的地区。以珠江三角洲东岸的东莞、深圳、惠州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主的全国最大的电子通信制造业基地,被称为“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其中,惠州不但是中国重要的彩电制造基地之一,拥有 TCL 王牌、康力、彩星、乐华四个在国内外市场颇有影响的彩电品牌,也是国际高级电工产品基地,拥有奇胜、国际电工两大品牌,占据国际电工市场份额的 2/3,还是亚洲重要的电路板制造基地。以珠江三角洲西岸的珠海、中山、顺德、江门为中心形成的以家用电器、五金制品为主的产业带。顺德拥有国内外闻名的科龙、格兰仕、美的等企业;中山则以“一镇一品”为特色,北部为小家电、小五金,中部为服装业

和家具业,西北部为灯饰加工,南部以外向出口加工企业为主。以中部的广州、佛山、肇庆为中心形成的汽车、电气机械、钢铁、纺织、建材产业带。通过与日本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汽车公司和国内东风汽车公司的合作,广州的汽车工业迅速崛起,一个以整车与零配件生产相结合的汽车生产网络正在广州和周边地区建立起来。佛山、南海拥有全国最大的纺织镇和全国最大的建陶生产基地^①。佛山照明、日丰建材管等都是省内乃至全国驰名的品牌。一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 5 个方面来量化考察中国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是目前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市场化的指数(NERI 指数)为 9.32 (2002)^②。开放和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珠三角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2、港澳:国际性服务业中心的形成

香港是一个拥有 680 万人口,1102 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服务经济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材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香港的人均 GDP 在 1994 年已达到 23,892 美元,仅次于卢森堡、美国和瑞士,居世界第四位。2003 年香港服务业的产值占 GDP 的比例高达 84.66%。香港四大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支援服务。2002 年上述四大支柱产业的产值和就业量分别占 GDP 和总就业量 12.2% 和 5.4%、26.5% 和 24.1%、3.0% 和 4.0%、11.5 和 10.4%。^③ 2000 年《世界经济论坛》(WEF)竞争力排名中,香港的专业服务竞争力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在 1999 年-2003 年期间,香港的服务输出在世界排名第十或第九位,2002 年香

港服务贸易总值为 3571.47 亿港元,服务贸易净输出为 1637.35 亿港元。2002 年香港的货物贸易总量为 31799.36 亿港元,其中转口贸易为 14295.90,占总量的 44.96%,在世界排名第十位。货物贸易是香港 GDP 的 252%,如果将服务贸易包括在内则是 280%。^④ 上述数据表明香港经济对外部经济的具有高度依赖,贸易和物流成为香港的第一大支柱产业。香港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是金融业。香港著名学者饶余庆教授根据 1995 年的数据资料,按照银行业、外汇市场、衍生工具市场、黄金市场和基金管理等指标,对香港金融业在国际上的地位进行了排名和比较分析,其结论是:“香港是亚洲太平洋区第二大国际金融中心,全世界第四大国际银行中心,和全世界第六或第七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能和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相比,但是香港至少和其他第二级的重要金融中心如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新加坡等齐名。”^⑤

香港以其独特的营商环境成为跨国公司云集之地和国际商务服务中心。截至 2004 年 6 月 1 日,海外公司驻香港的地区总部 1098 家,地区办事处 2511 家,当地办事处 2334 家。我们将以地区总部为例,按照母公司的注册地和营业范围、在港的主要业务范围和所负责管理的地区为标准,分析香港作为国际性总部经济的一些特点。按母公司注册国家或地区划分的地区总部公司结构特

① 陈广汉,李飒,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发展与演变,《提升大珠江三角洲国际竞争力研究》,陈广汉等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② 樊纲主持的《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③ 《香港经济年鉴 2004》,香港经济导报出版社,2004 年 10 月,第 542 页。

④ 《香港统计年刊 2003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⑤ 饶余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7 年 9 月,第 79 页。

征为：美国 256 家，占 23.3%；日本 198，占 18%；中国内地 106 家，占 9.7%；英国 105 家，占 9.6%；德国 67 家，占 6.1%；法国 47 家，占 4.3%；荷兰 46 家，占 4.2%；瑞士 39 家，占 3.6%；新加坡 35 家，占 3.2%；台湾 29 家，占 2.6%；澳洲 18 家，占 1.6%；瑞典 16 家，占 1.5%；加拿大、丹麦、韩国和意大利各 15 家，分别占 1.4%。这些地区总部公司在香港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从事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有 590 家，占总数的 53.7%；商用服务业有 247 家，占 22.5%；运输及有关服务业为 89 家，占 8.1%；金融及银行业为 69 家，占 6.3%；制造业为 67 家，占 6.1%。按照母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划分的地区总部公司为：制造业 434 家，占总数的 39.5%；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业 357 家，占 32.5%；商用业 172 家，15.7%；金融及银行业 102 家，占 9.3%；运输及有关服务业 90 家，占 8.2%。按区内所负责管理的地方（香港以外）划分的地区总部公司为：负责管理中国内地的公司有 975 家，占 88.3%；管理台湾地区的为 472 家，占 43%、新加坡为 402 家，占 36.6%、泰国为 345 家，占 31.4%、韩国 339 家，占 30.9%、菲律宾 323 家，占 29.4%、马来西亚 320 家，占 29.1%、日本 304 家，27.7%、印度尼西亚 284 家，占 25.9%、印度 236 家，占 21.5%、澳洲 239 家，20.9%。调查表明影响跨国公司选择香港作为地区性总部或地区办事处的前 10 项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排序为：资讯的自由流通、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廉洁的政府、不存在外汇管制、通讯运输及其他基础设施、政治稳定及安全、法治及司法独立、自由港地位、英语水平、中国内地商机。^①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香港是国际跨国企业覆盖亚太地区、特别是以中国内地为主的大中

华经济区的一个商贸服务中心。香港能成为这样一个国际商贸服务中心，除了其地理位置外，更为重要的是其经济和司法制度。

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即将发表的《2005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香港由 2004 年的第 6 位跃升至第 2 位，美国仍居首位，新加坡则由 2004 年的第 2 位降至第 3 位。美国传统基金会多年来一直将香港定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近半个世纪中，香港的经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第一、工业化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香港主要是一个从事转口贸易的自由港，对外贸易是香港的主导产业，中国内地是香港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20 世纪 50 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经济封锁和禁运。在美国的压力下，港英政府也参与了禁运行列，香港失去了与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内地开展贸易条件，使香港的转口港的地位和整体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香港被迫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内地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加上发达的国际商贸网络，使香港外向型的、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轻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以纺织品和制衣为主的出口加工业崛起，使港产品出口迅速增加，香港本地工业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70 年代初，香港港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曾高达 80%。^② 经过近二十年的工业化发展，香港从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

^① 《2004 年海外驻香港的地区代表按年统计调查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由于一个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会管理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事务，因此，按区内所负责管理的地方划分的区域总部公司数目比总数要大。

^② 张俊义：“战后对外贸易与航运”，《20 世纪香港经济》，第 191 页，刘蜀永主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 年 4 月。

港成为以港产品出口为主的自由港。1970年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及其在本地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制造业，30.9%；零售、批发、出口、酒楼、酒店业，19.6%；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18%；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14.9%。1971年上述四大支柱产业的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为：47.7%、16%、14.7%、2.6%。^①从产值和就业两个方面看，在1970年前后香港经济的工业化水平达到了峰值。进入70年代后，在纺织品和制衣的出口加工业继续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香港的工业和经济结构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以电子、钟表、仪器、家用电器和化工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金融、运输、港口、仓储、码头、商贸服务等新兴的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尽管制造业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其比重开始下降，贸易、金融和商贸等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二战以后，香港以其工业化主导下的高速经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是，与韩国和台湾省不同的是，香港的工业化是在一种完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出口加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因为香港与韩国和台湾相比，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初始条件完全不同。第二、后工业化阶段。从8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的制造业向中国内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区迅速转移，香港开始了向国际金融、贸易和商贸服务中心的转型。香港不仅迅速恢复了转口贸易港的贸易中介地位，而且成为中国内地引进外资的重要窗口。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对香港的进出口总值占内地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曾超过了35%；香港在内地的直接投资占内地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也曾一度超过65%。^②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贸易与投资的这种互补与互动关系不断强化，使香港的转口贸易不断增长。

2003年香港的转口贸易值是港产品出口值的13.3倍，占商品贸易总额的45.7%，是当年本地生产总值的1.33倍。制造业向内地的转移成就了珠三角地区工业的飞速发展，而珠三角地区生产能力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为香港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形成了对香港商贸服务的巨大需求。自1980年以来，香港的服务业年均增幅达到16%，香港逐渐形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与此同时珠三角的GDP从1980年的119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83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20.6倍，年均增长16.3%。珠三角的制造业年均增长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珠三角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变成为工业主导型经济，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香港向国际性服务经济中心的转型和珠三角向世界性制造业基地发展的过程在时间上的契合，来自于二者在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它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发展过程。

回顾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选择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以及1978年后中国内地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市场开放是影响香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两次转型的重要因素。进入21世纪的粤港澳新的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形成：香港将成为国际性的金融、贸易、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澳门成为国际性的旅游中心和区域性的商贸服务平台、广东及珠三角将发展为世界性制造业基地。在CEPA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下，港澳的服务业与广东和

^① 《香港经济贸易统计汇编》，华润贸易咨询有限公司编印，1988年12月，第13、19页。

^② 陈多主编：《港澳经济年鉴2004》，北京，2004年11月，第686、692页。

珠三角的制造业的合作将会谱写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三、形式、内容和机制：香港与内地经贸合作的三大转变

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标志着港澳地区与内地的经贸关系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它实质上是在“一国两制”和 WTO 的框架下，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之间的一种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的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认为：“经济的整合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措施，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之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① 因此，区域经济整合就本质上而言就是通过共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立，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产业分工和经济增长。经济整合可分为两种形态：功能性整合和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指某一区域内各经济领域实际发生的阻碍经贸活动的因素的消除和经济的融合，它主要是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和引导的结果，反映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不稳定性。制度性整合是通过区域内各成员建立的协议，并由特定的一体化组织管理机构加以指导和按照明确的制度安排的一体化过程。它反映了功能性整合的要求并将其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功能性整合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不断提高。因此，只有二者的紧密配合和相互促进，才能不断推进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与整合过程，欧盟的一体化过程就充分反映了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可见，

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的区域经济整合或经济一体化，以及为这种经济整合产生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制度性安排，不会影响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国两制”的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Tinbergen, 1965）在分析国际经济整合时，提出了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的概念。消极一体化指在区域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产生的，只涉及消除歧视与流通限制等方面的经济整合过程。而积极一体化指通过修订已有法律与机构和设置新的法律与机构，以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和集团内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从合作的形成看，CEPA 的签署表明香港和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将从功能性整合向功能性与制度性整合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方向转变。这一变化将会对粤港澳之间的经济合作产生重要影响。粤港澳之间制造业领域垂直的产业分工即“前店后厂”的模式合作将向建立开放和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的转变。从合作内容看：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合作将向服务业为主体的合作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之间的经济合作，主要在制造业领域。香港有近 6 万家企业在珠三角建立工厂，雇佣了 780 - 1300 万的工人，葵涌码头和香港机场物流的七成来自珠三角。CEPA 包括了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三大内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服务经济体系，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香港与内地特别是珠三角之间已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中国内地服务业对香港的提前开放和更加优惠的安排，为香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腹地，为两地的互

^① 贝拉·巴拉萨（Balassa, Bela）：《经济一体化理论》，伦敦，1961 年版，第 1 页。

利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从合作机制看：市场引导下的企业自发合作将向市场引导、政府规制和企业为主体的自觉合作转变。粤港澳之间过去以功能性整合为特征的经济合作，主要是在市场的引导下，由企业和商人推动的自发性合作。中国内地市场的有限开放、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要素价格的巨大差异造就了“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合作模式。当经济的整合或一体化从功能性整合发展到制度性整合层面时，政府将会在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不同国家或独立的关税区之间的经济整合中，需要政府签订各种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保证商品和生产要素能在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为区内的所有厂商创造公平的营商环境和国民待遇。CEPA 是在一个国家内，三个独立关税区之间的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因此需要有三方政府的协调与自觉推动。

四、本书的结构及其安排

“前店后厂”是 20 年来粤港澳经济合作的一种典型模式，当然它不能包括合作的全部内容。本书将以“前店后厂”的模式为基础，研究粤港澳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其演变。笔者认为粤港澳的经贸合作关系可以从纵向和横向的两种视角考察和研究，本书侧重于纵向地考察，分析粤港澳经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国内地市场的开放程度和粤港澳之间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影响粤港澳经贸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CEPA 签署和实施是区分港澳与内地以及粤港澳之间经贸合作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在“前店后厂”合作模式中形成地港澳与珠三角之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工体系是提升三地合作水平的基础。根据上述研究

思路，我们将结构分为十章三部分：第一篇是从合作形态或合作模式上，研究了“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及其对粤港澳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了 CEPA 框架下“前店后厂”模式的多样性发展形态，以及从“前店后厂”走向“统一市场”的历史趋势。第二部分题为“从‘制造业’走向‘服务业’”，从合作内容即产业发展的角度上研究粤港澳经贸关系的新变化。这一部分不仅分析了“前店后厂”模式中粤港之间制造业的合作机理和高科技产业合作现状与前景，还结合 CEPA 的背景，探讨了粤港澳之间在金融、物流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第三篇是从机制和体制上揭示粤港澳经贸合作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从“自发合作”走向“自觉合作”。因此，从“前店后厂”走向“统一市场”、从“制造业”走向“服务业”、从“自发合作”走向“自觉合作”是笔者以纵向的视角研究粤港澳经贸关系发展及其演变后，从合作形态（模式）、合作内容和合作机制上对其发展趋势作出的理论概括。我们的另一项关于港澳与内地以及粤港澳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将会从横向的视角展开分析，从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方面研究粤港澳的制度创新和最新进展。这两本著作可以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姊妹篇。

香港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曾经留下过痛苦的记忆。同时，香港在中华民族的再度崛起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独特作用。上述论点概括了我们近几年来研究香港与中国内地以及粤港澳经济关系的一些体会，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和研究，将这些论点和思路提升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希望本书的研究能为这一学术的积累尽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周多天）

提高澳门公共决策水平

应对未来的挑战和发展

刘伯龙*

一国、一地区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水平，对于一国、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有着关键的支持作用。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精英型决策模式已成为过去，高质素的政策制定为一国发展的关键，而高效率的政策执行是考验一国，一地区法律是否完善，能否以法治国的关键。澳门现在正处在这一阶段。澳门回归祖国仅仅六个年头，但澳门已彻底摆脱回归前“乡村角落”的形象，一跃而成为国际投资的热土。而澳门回归六年的公共政策水平如何？是否有一套完整的制定和执行程式？澳门是否需要建立一个官方层面的决策机构？将来应如何提高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水平？这正是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

一、澳门公共政策现状分析

回归以来，澳门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业绩。澳门 2002 - 2004 的 GDP 增长都在双位数字，去年更高达到 20%。澳门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者争相进入的地区，金沙、永利等大型美国博彩集团

的积极投资，使澳门已经成为亚洲的拉斯维加斯。今年三月金沙集团宣布立项的“金光大道”计划，金沙集团将联合全球十大国际品牌酒店集团，投资过千亿港币，将澳门的澳氹城建成金光大道，澳门必将成为国际游客争相造访的地区。¹ 现在，澳门的楼价是“海鲜市”，一天一个样，现在的楼价已比一年前增长了一倍以上。澳门特区博彩税收，从 1999 年回归时的 70 多亿澳门币，增加到 2004 年的 147 亿。² 如此骄人的成绩是如何得来的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祖国的自由行政策，和 CEPA 零关税安排，为港澳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使得身受非典重创的港澳经济进入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答案对香港来说十分正确，但对澳门来说就是另一个故事。以我个人的观察，澳门回归以来的经济飞跃，主要归功于一个人，一项政策。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特首何厚铨先生，他有个人的领导魅力，惊人的判断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一项政策就是赌权政策。在赌权开放以前，澳门经济十分困难，两次有失业工人上街游行，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澳门的各行各业都十分萧条，一到晚上各酒店餐厅都门可罗雀，新楼

* 作者现为澳门社会科学协会会长

宇空置相当严重。而在此同时,澳门的垄断性赌牌即将到期。澳门社会有开放赌权的声浪,但声浪不大,毕竟澳门娱乐有限公司在澳门经营了几十年,是澳门的主要税收来源和最大顾主。如果赌权开放对澳门影响举足轻重。在此关键时刻,是特首决定了开放赌权。³这是渐进式开放,也就是将赌牌的数目由一块增加到三块。这一政策变动对澳门来说是划时代的。澳门的赌权开放过程公开和透明度很高,吸引了全世界 20 多家顶级娱乐旅游集团前来竞投。澳门举一次以正面消息登上了 CNN 的新闻频道。⁴当中标的三家公司提出自己的投资方案时,澳门轰动了。每家公司都保证在澳门投资不少于 50 亿澳门币,澳门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投资会投放到澳门这么一个小城。而在去年,当第一家公司在澳门投资的金沙赌场投入运行,并在短短 9 个月内收回成本,开始赚钱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其他执牌公司也加快建设它们在澳门的投资项目。今天的澳门已与 5 年前完全不同,各行各业一片兴旺,烂尾楼成了抢手货,房地产价格火箭般地上升。赌权的开放使澳门雨过天晴,而特首在决策中的作用是“精英决策”的典型案列。澳门政府并没有官方的决策机构,民间的决策咨询系统也相当弱,并没有成熟的咨询网路,但澳门却是成功了。

但澳门也有优势,那就是政策的执行比较严肃,依法办事的观念在政府已根深蒂固。从赌权开放的程式来看,一旦决定赌权开放,整个程式十分透明而有序,特区迅速成立了赌牌评审小组,并公开了评审条件和程式,华人的裙带关系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美国拉斯维加斯两家国际极娱乐集团入选,一是以创立豪华家庭式旅游度假村的永利集团,一是以举办大型国际会议而闻名于世的金沙集团。整个甄选过程公平、透明,依法进行,令全世界对澳门刮目相看。

赌权开放以后,澳门经济发展前景明朗化了,

前途一片光明。考验接踵而来,为了对应世界贸易组织对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澳门和珠海商讨建立了跨境工业区。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澳门工商界信心的作用,对于稳定澳门经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非典以后,为了应付澳门失业率高居不下的困境,特区连续 2 年举办了失业人员培训班,使失业居民可以在培训中得到技能培训,也使得毕业大学生可增加工作的本钱。更重要的是,失业人员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费,不必走上街头游行,稳定了澳门社会。

二、决策科学在澳门的需要

回归 6 年来,澳门已经为国际投资的一块热土,成为亚洲一颗亮丽的明星。在此基础上,澳门必须建立官方层面的专业决策机构,加强决策能力,完善决策咨询机构,以应付下一阶段澳门面临的挑战。

澳门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总量已达到一规模。经济向前走,但高速增长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目前来看,澳门赌业的合理布局和发展潜力已成为未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澳门已出现了许多新的赌场,包括金沙、银河和澳门娱乐有限公司分包出来的希腊神话、金龙、皇家金堡等多家赌场。澳门赌台的数目从去年的 800 张扩大到今年的 1600 张增加了 1 倍。据估计,如果金光大道、永利度假村等大型赌场在 2 年后相继落成,澳门的赌台数目会增加到 3,000 多张。澳门现在的赌权开放速度,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原来的循序渐进的形文模式,如此风速扩张,如果赌客数目跟不上,会形成巨大投资泡沫。一旦各赌场之间形成恶性竞争,削价吸客,必将形成赌业的混乱,澳门经济的退缩和政府税收的不稳定,对于澳门未来的发展可不是一件小事。澳门民间在这方面的议论不少,但落实

到政府方面重视不足。至今也没有一个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对此作出理性而详细分析,情况令人担忧。再看澳门的人力资源问题,澳门由于基建成扩展迅速,大型赌场相继在规模招人,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度紧张,中小企业齐喊救命,很多中小企业就此倒闭或关门,无法再经营下去。就是澳门常为人诟病的家庭女傭来照顾他们的小孩和做家务也成为澳门中产阶级的后顾之忧。当然,特区政府已成立了政府层面的人力资源委员会,并已发表了两份报告,但整个决策程序仍是相当缓慢,劳资双方的利益很难协调。决策处在议而不决的阶段。有议员在立法会指出,博彩开放,政府的政策倾斜博彩公司。政府之并没有评估澳门整体经济、社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如果中小企业人力资源不足,政府解决这方面的速度太慢,最终会令中小企业破产。⁵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制定出一个公平但又灵活的输入外劳政策,谁又再敢来澳门投资呢?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澳门产业结构过于单调的问题。这几年旅游博彩业一枝独秀,但其他行业仍未在澳门找到立足之地,离政府要求的“龙头带头,适度多元,协调发展”仍有很大的距离。⁶社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坚持自由经济思想,认为政府不应在经济政策上给与某些行业优惠政策,以鼓励这些行业在澳门的发展,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只能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政府所做的只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由于特区的主要领导都来自商界他们为了避开瓜田李下之嫌,比较同意以上观点。但实际的情况是全世界的政府都在进行积极的市场指导,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做法,美国和欧洲的政府也是在不遗余力地在做。而澳门的实际情况是如果将来特区单靠旅游博彩业支援,经济结构过于单调,将来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有澳门舆论指出,“澳门的出口加工业萎缩的趋势,但博彩旅游业一业独大,且越来越倚重内地客源,澳门

的赌业与娱乐事业与内地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内地政府不可能长期容忍澳门人‘赌’和‘黄’为吸引国民的卖点。中央政府已经逐步加紧限制公务人员出外旅游赌博,当这些大陆大豪客减少来澳门豪赌之后,澳门的博彩业将会如何?”⁷现在亚洲地区新加坡已经决定开赌,日本和台湾也在考虑,而中国政府已在禁赌,禁止党员干部在境外赌博。而澳门赌业一旦萎缩,将对澳门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而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支持,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不花库房一分钱,也可以支持一些相关行业在澳门的发展。在政府支持方面,可以利用免费土地赠与、税收优惠、政府无息贷款等多项政策优惠,来扶持一些行业在澳门的发展,如离岸金融业、环保行业、会议展览业在澳门的发展。

所有这些与澳门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重大公共政策,都必须由政府的官方政策制定机构,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对重大公共政策在科学的意义上进行相关政策的资料收集、可行性研究、公开咨询、政策制定等工作,以保证澳门公共政策不再是“精英决策”,而是高品质、专业性很强的理性决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澳门公共政策的及时出台。由于澳门还没有官方层面的决策咨询机构,类似以上的重大政策决策和修订,特区政府都必须组织相应的临时决策参谋班子,经过一段较长的磨合阶段,才能有政策出台。澳门现在在一事一议的决策模式,从确定问题到组织相关人士和专家进行调研,到出台政策报告,需要很长时间,往往容易耽误决策所需的宝贵时间。现在澳门经济发展很快,很多政策必须及时出台,时机一过,本来是好的决策也会过时,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应该逐步建立起自己专业的决策参谋机构。一旦出现新的重大问题,可以在政府要求的时间内拿出专业性的决策

方案,供政府决策时参考。这样的执政能力,才是现代高效率政府的基本要求。

政府的专业决策参谋和咨询机构是现代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在澳门的周边地区,特别是香港和祖国内地,都已经建立了政府层面的强有力的决策参谋机构。香港的中央政策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参谋机构,它拥有自己的预算和专门研究人员,在香港民意、社会、经济、珠江三角洲合作各领域都有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报告,是特区执政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祖国内地近年来十分重视决策科学院的发展,在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建立了专有的政策研究办公室。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都有自己的专职研究部门,它们在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也保证了中央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和基建专案的高品质和高水平。澳门虽小,但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相当于中国的副省级城市,如广州、深圳等。再加上澳门是中国“一国两制”下的两大特别行政区之一,它的成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超过其本身经济实力所达到的比例。所以我们相信,澳门是到了建立自己的专业决策参谋机构的时候了。

三、结 论

澳门在回归以后经济上一片欣欣向荣,祖国的自由行和 CEPA 给与了澳门巨大的帮助,但澳门的经济奇绩主要取决于一个人和一项政策。特首英明果断,决定赌权开放,是澳门这几年经济兴旺的主要原因。美国国际级大财团对澳门的大量投资,是导致澳门经济繁荣,房地产飙升的主要原因。但澳门的公共政策不能老是依赖“精英决策”的模式,必须以民主、科学的方式,以保证澳门公共政策的高水平。笔者建议澳门按国际通行做法,在特区政府成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以加强澳门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及时性。

现在特区政府应因特首对提高生活质素的允诺,已经成立了以澳门大学董事会主席,前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谢志伟为所长的生活质素研究所,对澳门社会提高生活质素提出全面建议。由于生活质素覆盖面广泛,包括政治、法律、政府效率、社会、卫生、环保各方面的内容,所以实际上这个研究所的建立就是澳门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雏形。笔者希望澳门政府重视公共政策的发展,建立政府层面的相关机构,以保证澳门重大公共政策决策质量优秀,公开透明,符合现代公共政策的决策要求。澳门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而面临的各种挑战也在增加,必须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才能给全体市民及外来投资者带来巨大的信心。

注 释:

1. 据报载,金沙集团将于路氹连贯公路两旁发展其金光大道计划,模式类似拉斯维加斯大道,整项计划投资额约 120-130 亿美元,有近 20 间酒店,提供约 6 万间客房,需时约 7-10 年。详见《华侨报》,2005 年 3 月 19 日,第 1 页。

2. 《新华澳报》,2004 年 3 月 7 日,第 1 页。

3. 当时我看不到报章上有热烈的讨论,在特首办举办的专家学者讨论会上,有个别人士对赌权开放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但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而我最后看到的结果是赌权开放。

4. 回归以前澳门也曾上过这新闻频道,那是报导澳门发生枪战事件,报导澳门的黑帮互斗,治安不靖。

5. “议员关注人力资源问题”,见《新华澳报》,2004 年 11 月 27 日,第 1 页。

6. 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表示:“机构单一成经济持续发展隐患”,见《澳门日报》,2004 年 11 月 27 日,第 1 页。

7. “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发展”,见《澳门日报》,2005 年 1 月 2 日,第 4 页。

(责任编辑:陈丽君)

继往开来 探索无止境

——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 20 周年偶感

周运源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长河中，20 年恐怕也只是弹指挥间的事情。然而，对于澳门社会科学界来说，也许是充满着潜心探究、奋力拼搏、激扬文字和成果显著的不平凡岁月。

20 年前的 1985 年，正值澳门处于回归祖国前夕，是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之间陆续开展多个回合的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的特殊时期^①，澳门社会科学界的有识之士，与其他功能界别的朋友一样，对澳门经济社会等的发展状况存在不少忧虑，而对于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寄予厚望，尤其是对澳门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充满信心。当时，面对回归前澳门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着深入了解和分析澳门经济社会等深层次的问题，全面把握澳门在新时期面临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对澳门在祖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澳门在其中所承担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任务，也为着使澳门在新时期继续发挥中国内地联系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盟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为着进一步

拓展澳门社会科学界等，与祖国内地甚至海外学术界开展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合作等等，澳门一批专家、学者率先发起并组建了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他们秉承“研究澳门、服务社会”的宗旨，联系了一批澳门本地有志研究澳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时也首度开展与祖国内地同行的接触和联系，邀请了内地若干知名学者、专家（主要是广东省社会科学界的）作为内地特邀会员参加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的相关活动。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不久，澳门社科界就牵头组成访问团，先后访问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及其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等内地高校和科研单位，并与这些单位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当时，笔者曾在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肇斌教授的带领下参加了相关的活动，并在怀士堂（小礼堂）前合影留念）。尔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也相应组织这方面

^①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是在后来的 1987 年 4 月 13 日正式签署的）

的专家、教授,对澳门社科界进行回访并开展相关研究专题的学术交流,加强了粤澳社会科学界的联系和合作。

1987 年 4 月 13 日,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为澳门社会科学界探讨澳门回归前后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的互访交流联系中,彼此都感觉到需要通过一个固定的联系与合作形式,进一步把双方社会科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过双方的多次协商,议定从 1988 年开始以“粤澳关系研讨会”的形式,每年在广东的广州或者广东省内的其他城市如江门、佛山、深圳、珠海、肇庆等市,召开涵盖粤、澳两地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法律等领域为主题的研讨会,第 2 年则移师澳门,继续对上述领域的热点或其他重点问题进行研讨。如此循环进行,自 1988 年开始截止 2004 年底的统计,“粤澳关系研讨会”前后共召开了 16 次,先后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多达 2000 多人,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大,是国内与境外联合召开的社会科学研讨会所不多见的。

在历次研讨会上,粤澳两地(当然有些时候也有香港以及北京、上海等地专家、学者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学者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并得到政府或其他部门的高度重视,有的还被列为当地政府或部门的决策参考。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粤澳关系研讨会对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科学领域舆论导向的良好影响和重要作用。记得在澳门回归前的那次粤澳关系研讨会上,当时重点研讨的主题,

是回归前澳门的社会治安不靖,带来对整体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影响,不少专家、学者因此建议回归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应从源头上抓好澳门社会治安的管治,应与广东的警方建立联系打击黑社会或其他跨境犯罪的活动等,事实证明,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的确花了大力气,净化了澳门的社会治安等比较棘手的问题,开创了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社会治安的良好秩序和氛围,由此大大促进了澳门经济、社会等的全面持续稳定发展。

其次,在粤澳关系研究的 20 多年中,无论是探讨研究的论文,还是著作均有了一定的沉淀和积累。据笔者的了解,广东省社科联从开展粤澳关系研讨以来,先后出版了三本颇显影响的著作,例如 1994 年 8 月出版的《粤澳关系研究》,汇集了第一届到第七届粤澳关系研讨会的主要论文,1995 年 5 月又出版了《粤澳关系与澳门研究》(集中了粤澳关系研讨会第 8 到第 11 次的论文),继而在 2003 年 10 月又出版了《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当然,其间还有不少发表在内地及港澳地区相关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在 2005 年初首届澳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奖的论文和著作中,就有不少是粤澳关系研讨会的成果。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前会长黄汉强先生,首先倡导和主持完成了重要的研究报告“内地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澳门的应因思路”,课题组的广东、澳门专家一起,进行了前瞻性和务实性的研究和探索,该研究成果为我国中央政府最终制定和实施“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 CEPA),提供了颇有参考价

值的研究资料。

再次,在粤澳关系第 15 次研讨会上,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的主要领导,以新的发展理念,广开领域进行生动活泼的学术探讨。在研讨会上,粤澳学者、广西、云南和贵州三省区的社科界的同行一起提议,把过去粤澳两地社科界的学术交流活动,拓展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澳门五个省区的大范围、宽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因此,(2003 年 11 月在澳门召开)的第 16 次粤澳关系研讨会上,来自 5 省区 300 多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澳门与内地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问题。这次粤澳关系研讨会围绕内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与会的专家、学者集中在寻根塑源,珠江水系源自云南马雄山^①,如何构建珠江流域西部旅游走廊集思广益,当然,此次研讨会同时涉及了五省区的经济、文化教育、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内容,并且经过各方的协商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决议,即以后的粤澳关系研讨会,分别由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澳门轮流主办,并初步确定第 17 届粤、桂、黔、滇、澳五省区关系研讨会首先确定在云南召开。2004 年初开始,我国内地对香港、澳门地区实行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尤其是其中先后开放内地居民赴香港、澳门的“自由行”,大大促进了香港、澳门与内地经济社会更全面的联系与合作发展。尽管后来由于 2004 年初的爆发 SARS,以及其他另外因素的制约,使新一届澳门与粤、桂、黔、滇关系的研究会暂时未能召开,然而笔者相信,在新的一届澳门社会科学学会领导及其机构与广东等

省区社科联同仁的协商下,新时期澳门与内地省区的社科界的联系合作将更为紧密,学术研究与探讨必将更加丰富、务实和卓有成效。

光阴似箭,澳门社会科学学会走过了 20 周年的风风雨雨,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证明,社会科学研究是没有地域界线的,尤其是澳门在与祖国大家庭紧密联系的条件下,双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交流、认同以及学术创新等,必定会促进和推动中华民族整体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法制等的逐步完善和可持续发展。我们相信,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新一届的领导集体,将以新的治会理念为行为准则,新形势下在继续加强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本身健康发展的同时,无疑会继续推进澳门社科界与祖国内地尤其是广东,甚至国外的学术交流联系与合作活动。我们也相信,澳门社科界的同仁们在持续开展并活跃新时期澳门的学术活动中,在结交更多的新朋友(特别是学术界同仁),也必定会继续保持与过去合作数十年的众多老朋友的更为紧密的交流和合作活动,同样也将会继续坚持“研究澳门、服务社会、继往开来、探索不止”。为澳门特区更美好的明天,做出更加卓有成效、成果更为显著的研究与探索。

(以上的认识仅仅是作者的一孔之见,并以此短文追忆导师陈肇斌教授和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前会长黄汉强先生)

2005 年 10 月 18 日作者于广州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论文章)

^① (当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所拍的电影《珠江颂》,以及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对珠江源头的题字就是证明)

香港遭受恐怖袭击可能性分析

言 军

当今世界不安宁，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正日趋全球化、复杂化和持久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不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这类危机。

“自杀式袭击”自古有之，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外国历史上的“恐怖手段”或“恐怖行动”也由来已久，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众论话题，似乎起自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19 至 20 世纪的国际政治风云中，“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的指责时有所闻。那时，人们关注的侧重点不是“恐怖”本身，而是其行为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当法国凡尔赛政府指责巴黎起义工人放火时，马克思公开申明：“火乃是一种正当的武器。”

目前世界上通用的“恐怖主义”这个名词，无论从概念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混乱不清的，极不确切的。与此相关，“反恐”的含意也正在被滥用。但这都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暂时不述。

当前的所谓恐怖主义问题，是一个特定历史条

件下的特殊现象，我们只能对它作特例研究。有学者将目前所发生的那些被称作恐怖袭击的行为，定义为非国家行为的武力袭击，它可以是个人行为，也可以是有组织行为，一般多是有组织行为，笔者暂且以这个定义为依据去分析有关问题。

可能性评估

伊斯兰极端势力是当前国际恐怖袭击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其行为性质是对西方大国霸权主义及企图以单一“文明”统治世界的一种非理性反抗。当然，其中还有宗教的内涵。至于反而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俄罗斯国内的车臣武装和中国新疆的“东突”势力，虽然与之有密切关系，但属于另一性质。这正说明恐怖主义的复杂性，也说明反恐正被人“为我所用”。

既然当前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目标是西方大国及其支持者，中国版图内的香港自然就不属于他们的打击对象。如果香港仍然在参与攻打

伊拉克的英国管治之下,可能早就被人盯上。现在,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可以说是世界上较安全的国际大都会之一。有些香港同胞已有自知之明,他们出外旅行,宁使用特区护照而不使用英国人发给的 BNO 护照,以策安全。

但是,由于香港地位的特殊性,又使它有着受到恐怖袭击的潜在危险。首先,美国及其盟友英国、日本在香港的机构(包括公司地区总部和办事处)就超过 1000 个,这无疑是明显的目标。其次,香港作为国际旅游城市,外国游客中又以美国人居多,英国和澳大利亚人次之。而近期所发生的多起袭击事件,以西方游客为目标的特征十分明显,印尼巴厘岛一案最具典型性。在香港旅游的美、英、澳人士,应多加小心。再次,作为打击目标的犹太人在香港也为数不少,以色列公司就有 60 多家。而每周五、周六和犹太教假日,聚集在罗便臣道“莉亚堂”的教徒,也可能成为袭击对象。某些与西方国家有特殊关系的本地社团,也会“当选”为目标。

繁忙的集装箱码头和港口以至货轮,背后也隐藏着危险。有消息透露,某家香港船运公司曾被恐怖组织锁定为袭击目标,因为它“为美国运载用来攻击伊斯兰战士的军用物品”。而作为全球最繁忙的空港之一的香港国际机场,也容易受到恐怖分子光顾,要提防五十年前“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类似事件重演。

至于“疆独”可能通过其国际支持者利用香港进行恐怖活动,这是必须提高警觉和密切留意的。香港保安局就曾经接到消息,说某个与“疆

独”可能有关联的组织,企图袭击中国银行和中华旅社等中资机构,目标还包括驻港解放军。

有人还担心恐怖活动的“示范”作用,可能会引致恶性后果。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及其行为方式,通过传媒渲染,已家喻户晓。个别思想极端或对社会不满的人,以至青少年,可能“有样学样”,以非理性方式发泄怨恨,引致市民受伤害。香港 1966 年发生的“天星小轮加价事件”触发群众骚乱,我们仍记忆犹新。对此类情况在新环境下以新潮流的形式出现,不可不防。

反全球化运动虽有过激行为,但它不是恐怖组织,其性质包含有反对富国操纵世界以及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等合理诉求,具有一定的正义性。有论者认为,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式微的今日,重新集合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但其背景和成员十分复杂。对于他们于世贸部长会议期间到香港示威,似乎应有正确和妥善的对策。特区政府需要警惕的是其中极少数人的暴力倾向,更要密切留意本地某些政治势力的介入。最重要的是,不可单纯当作保安问题而必须当作国际政治问题去处理。万万不可大意。

还要特别提醒,某些西方国家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可能会将香港牵入其“反恐”国际网络之中。如果香港被卷入某些“共同行动”,不仅无助于自身安全,反而自我制造目标,这是十分危险的。香港必须正确认识自身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地位,保持“超脱”和“独立”,做自己应做的事。从近期动态来看,还要警惕某些国家以“反恐”为名,有意提供虚假情报或者公开散布谣言,

制造恐慌和混乱。我相信,香港有关部门对此是清醒的。

承受力分析

香港具有高效的保安系统,也有先进和完备的消防、救护力量,通讯、交通都十分便捷,这是应付突发事件的有利条件。但是,某些根本性的因素,使其承受力存在较大问题。

首先,香港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对社会稳定的敏感度特别高,遇有突发事件,会即时影响经济环境。同时,它作为开放的自由港,每天有数十万人出入境,恐怖分子混杂其中可说是防不胜防的。袭击者运送微型炸弹以至生化毒剂,难以严密监测。

其次,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每平方公里达 6000 人,某些人口稠集地区更高于这个数字。繁忙的地铁,每日平均载客约 230 万人次,每小时平均载客约 9 万人次。在高峰时段经常每小时有 10 多万人流量。如遇到袭击,不论是遗下物件式或者背包式的非自杀性或自杀性爆炸,其后果都会比伦敦地铁严重得多。道路交通方面,海底隧道车流每小时平均 5 千辆次,狮子山隧道则有 3 千多辆次,香港仔隧道也达到 2 千多辆次。而且在各条交通要道,常常出现堵塞的车龙,如果其中一辆西方游客巴士被炸,后果难以估量。

再次,招募当地人充当“爆炸手”,已是近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特征。当前的主要恐怖组织利

用宗教和种族关系招募成员,香港人口构成的复杂性正为它们提供便利。当你走进尖沙咀弥敦道重庆大厦,眼前的景象便会使你明白这一切。还有更多的这类人士分散定居在港九各个角落。对于这些鱼龙混杂的人群,警方的监控能力是有限的。当然,这 10 多万人之中,绝大多数是守法居民,但这个人群的存在,确实成为反恐工作的难题。

至于香港市民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应当承认是较为欠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经历了 1956 和 1967 年两次较为严重的动乱。近 10 年间,也尝过不少“甜酸苦辣”。但总的来说,香港人是过了 60 年太平的日子。今时今日,市民正在为经济复苏及社会气氛改善而欣慰。长期沉浸于和平安乐环境的心态,一旦遭遇突发事件,会即时转化为惊惶失措。

再从香港社会整体反应能力来看。一般市民对涉及个人及家庭切身利益的事情,极度关心而且敏感。但对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大局,则态度冷漠。“沙士”时期的情况表明,这里缺少“和衷共济”和“顾全大局”的社会氛围。当前的分化状况,也阻碍着“一致对敌”的组织和动员。而且还会有人借助法律,干扰政府所采取的强力保安措施。这都是一些负面的因素。对此,应当设法加以克服。

香港保安局对当前遭受恐怖袭击危险性的评估是“中度”,应当说,这是符合实际的。香港市民既不要麻痹大意,也不必草木皆兵,但必须有自知之明,作好万一的准备。

(责任编辑:陈丽君)

建立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动物防疫体系

黄瑶 邢益强

2003 年的“非典”危机催生了广东省、香港、澳门三地防控传染病的合作。此合作开展至今已两年多, 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① 然而, 从三地合作的内容来看, 现有合作的广度还远不够, 仅侧重在传染病疫情通报机制、传染病科研合作和人才交流培训三方面, 其他方面的合作只是进行了初步交流, 而在动物防疫方面的合作尚缺乏。但动物给人类传播传染病的危害已日趋严重, 特别是高致病禽流感疫情已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② 对此, 本文拟借鉴欧盟的有关经验和做法, 结合粤港澳三地的现状, 提出建立一套三地统一的动物防疫体系的一些设想。

一、加强三地动物防疫合作的紧迫性

近年来, 传染病疫情层出不穷, 欧洲爆发疯牛病, “非典”在亚洲地区肆虐, 东南亚国家多次爆发禽流感疫情, 最近我国四川省爆发了猪链球菌感染疫情等等。传染病迅速传播,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不仅夺去了许多宝贵的生命, 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 而且, 在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而这些新发的对人类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大多与动物有关, 都是由动物传播的传染病。以动物为病源的传染病可以分为三类: 一种原本属于动物传染病, 即只在动物身上发生的传染病, 而在近年来却出现人类感染的情况, 例如禽流感和猪链球菌等; 第二种则是人畜共患病, 是人和脊椎动物由共同病原体引起的、存在流行病学关联的疾病, 它分布广泛, 既危及人类的健康, 又影响家畜健康及其生产力; 第三种是动物作为病媒传播的传染病, 例如蚊媒传播的登革热、日本脑炎等传染病, 鼠媒传播的鼠疫等传染病。目前国际上新发现的传染病有 40 余种, 以病毒性传染病居多, 大部分属于动物源病。

^① 粤港澳三地合作防控传染病的情况, 可参见以下文件: 《粤港澳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专家组首次会议纪要》、《粤港澳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专家组第二次会议纪要》、《粤港澳防治传染病专家组第三次会议纪要》以及《粤港澳防治传染病专家组第四次会议纪要》, 这些文件均由广东省卫生厅提供; 《粤港澳防治传染病专家组第五次会议新闻稿》, 澳门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05 年 7 月 14 日新闻稿第 038/CDC/2005 号, 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官方网站: <http://www.ssm.gov.mo>, 2005 年 7 月 15 日访问。

^② 参见“禽流感六问”, 载《参考消息》2005 年 10 月 22 日第 7 版。

除了这些已经发现的传染病外,自然界潜伏着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疾病的巨大危险。据统计,目前已发现 1709 种病原微生物,其中 832 种是动物源性或称动物性传染病。在新发现的 156 种动物传染病中,有 114 种可传播给人类,占 73%。^①并且,由于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以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导致很多动物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性和生活环境,这些改变将可能导致各种动物传染病产生变异、变种,加强感染性,从动物传染病转变为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禽流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这些变化将加剧多种动物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也将导致动物传染病随着迁徙而向人群以及更广范围扩散。因此,加强防范动物传染病应成为未来人类防控传染病的重点之一。

从粤港澳三地的实际情况来看,粤港澳地区的居民有爱吃海鲜野味的饮食习惯,也有饲养宠物的习惯,因而在粤港澳地区出现由动物传染人类传染病的可能性就很大。“非典”由果子狸传染给人类,疫情在广东地区首先爆发,恰好与广东居民爱吃野味的习惯密切相关。“非典”疫情突显了由动物传染人类传染病的严重危险性,也突显了在粤港澳地区爆发动物传播的传染病的高风险性。其次,许多动物(主要是人工饲养的家禽、家畜等)及其制品,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盘中餐”,存在着经由食品传染疾病给人类的极大危险。例如,1996 年英国政府公布一项研究报告,承认疯牛病有可能通过食物传染给人类,使人患新型克雅氏病,即人类海绵状脑病。^②因此加强动物防疫,保证食品安全刻不容缓。最后,港澳地区的生猪、活家禽等食物主要由广东省提供,随着三地紧密的经贸往来,由食用动物导致传染病在三地跨界传播的危险也可能增加。总之,粤港澳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未来必须警惕动物传染病,加强动物防疫的合作。开展三

地在动物防疫方面的合作有助于预防传染病在人群爆发和蔓延,有助于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居民的生命健康,也有助于减低动物传染病在三地跨界流行的危险。

但目前,粤港澳三地防控传染病的合作尚未涉及动物防疫领域,这反映了现有合作的欠缺。基于动物传染病的严峻性,未来三地有必要加强动物防疫这一重要环节的合作,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控的合作。

二、欧盟建立动物防疫体系的经验值得借鉴

要填补粤港澳三地动物防疫合作的空白,需要放眼世界,学习借鉴世界上有关动物防疫合作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在学理上,虽然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关系属于一个中国内的区际关系,三地之间的区际合作不同于欧盟的国家之间一体化的合作模式,但是,传染病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小,而且防控传染病具有规律可循,各国及各地区采取的防控传染病措施具有共通之处,其合作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趋同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中,欧盟在动物防疫方面成熟的合作内容和先进的技术是值得研究并借鉴运用到粤港澳三地的合作中的。

在应对疯牛病危机中,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意识到了加强动物防疫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危机过后,欧盟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家畜家禽传染病防疫体系,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动物传染病。^③

^① 张子群、阙保东:《警惕动物传染病或人畜共患病的流行》,《中国检验检疫》2005 年第 2 期,第 25 页。

^② 张子群、阙保东,前引文。

^③ 《欧盟动物防疫体制日趋成熟》,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3/01/content-1339308.htm>, 2005 年 4 月 9 日访问。

通报系统连接欧盟总部以及各成员国相关防疫机构,并设置了统一代码以方便报告各种动物疾病。各成员国根据欧盟的报告制度,还制定了相应的通报法规。当某成员国某地出现严重动物传染病时,农场主必须立即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该国必须在确定疫情后 24 小时内通过通报系统向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报告。系统的自动程序会把信息立即传到欧盟及各成员国的相关机构,这些部门会迅速评估疫情,共同拟定应对方案。此外,欧盟防疫机构还将对疫情信息进行分析整理,每周向成员国统一传送整理过的信息。

当传染性很强的重大疫情首次爆发时,通报系统将全天候运作,欧盟及各成员国会不间断跟踪传来的疫情信息,并及时做出必要反应。这一通报机制不仅保证欧盟及各成员国迅速得到详细的疫情信息,而且由于信息透明,其他地方的家禽家畜及其制品的交易可以免受个别疫情的不必要影响。

欧盟还有一套专门针对可以由牲畜向人传染的动物疾病通告汇总制度。各成员国要收集本国有关这类疾病的信息,并于每年 3 月底汇总到欧盟总部的兽医防疫部门。欧盟防疫部门将根据汇总来的信息出版年度报告,并与各国防疫部门一起跟踪这类疾病的发展动向,并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欧盟各国 2500 多个兽医防疫机构通过电脑系统已形成一个紧密网络,以对境内的家禽家畜及其制品的交易进行监控。防疫机构会通过这个网络对产品的交易和跨境流动向相关兄弟机构事先进行报告,以保证在出现问题时可以迅速回收产品并采取恰当的控制措施。各成员国还设有针对各种家禽家畜疾病的专门实验室并形成了网络,针对疾病的统一实验保证了对疾病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并采取相应措施。

在处理疫情时,欧盟各国基本统一的防疫措

施。欧盟规定,在发生重大动物传染病时,发生疫情的农场必须立即将所有的发病牲畜或家禽用安全方法杀死并销毁,疑似病畜或病禽有时也要一并杀死及销毁,并对健康家禽家畜接种疫苗。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各国防疫机构必须立即把发生疫情的地区及临近地区设置成隔离区,禁止家禽家畜及其制品和粪便等的流动。如有必要,与发病农场有过接触的临近农场也将被定为隔离区。

重大紧急疫情出现时,有关国家会制定紧急方案,欧盟将对其防疫措施提供资金支持,其中包括对因疫情而受损失的农场提供补偿。个别情况下,欧盟防疫机构会为发生疫情的国家制定补充措施,并号召各国开展紧密合作,以确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03 年 3 月,荷兰发生禽流感疫情,与其接壤的德国各州严阵以待并与荷兰相关机构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与荷兰临近的一些德国农场还被纳入了荷兰卫生机构的监控范围。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欧盟国家如冰岛、挪威及瑞士等也加入了这个防疫系统,欧盟的动物防疫体制正日趋成熟。

三、建立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动物防疫体系的设想

鉴于动物可能传染给人类传染病,可能造成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巨大危害,特别粤港澳三地居民的饮食生活习惯与动物息息相关,因此建议借鉴欧盟的经验,并根据粤港澳三地的实际情况,建立起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动物防疫体系。该体系可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将包括卫生医疗管理、农业、畜牧、兽医、食品监管、检验检疫等部门纳入到合作的机制当中。特别是针对三地防控传染病合作尚未包括农

业、畜牧、兽医等方面的情况, 必须加强这些部门的对口交流和信息通报, 按照已有的三地卫生医疗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 建立农业畜牧等部门的对口交流机制。同时, 应加强动物防疫的跨部门协作, 即在卫生管理、医疗机构、农业、畜牧、兽医、检验检疫以及食品监管等多个部门之间形成交流合作的网络, 建立有关动物防疫的跨部门协调小组, 负责促进部门之间的交流, 协调部门之间的防控措施。

2. 在三地全面设置动物传染病的监测点, 即在三地的兽医防疫站、农场、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等地点设置监测点, 并将各监测点联系起来建立动物传染病的监测网络, 以便长期观察、密切留意动物传染病的发展情况, 收集相关数据, 分析评估未来动物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及向人类传染的可能性。针对主要的动物传染病建立专门的监测网络, 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库。此数据库可为卫生管理人员制定有关防控措施时参考, 也可供科研人员使用。

3. 建立动物传染病信息通报系统。该通报系统应连接三地传染病防控合作协调办事处和三地相关防疫机构, 并设置统一代码以方便报告各种动物疾病。当某地出现严重动物传染病时, 农场主必须立即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 该地必须在确定疫情后 24 小时内通过通报系统向协调办事处和其他两地报告。系统的自动程序会把信息立即传到三地的相关机构, 这些部门会迅速评估疫情, 共同拟定应对方案。

4. 建立专门针对可以由牲畜向人传染的动物疾病通告汇总系统。各地要收集本地有关这类疾病的信息, 并汇总通过系统提交, 协调办事处中的有关动物防疫的委员会则应根据三地汇总得到的信息发布年度报告, 再反馈给三地的相关部门。

5. 三地所有的兽医防疫机构通过电脑系统形成一个紧密网络, 以对地区内的家禽家畜及其制品的交易进行监控。防疫机构会通过这个网络对产品的交易和跨境流动向相关机构事先进行报告, 以保证在出现问题时可以迅速回收产品并采取恰当的控制措施。

6. 对三地农场, 尤其是广东省内供港澳活禽畜的农场, 实施注册管理制度, 定期检查防疫情况, 保证供港澳的活禽畜及其制品的卫生安全。

7. 在出现动物传染病疫情时, 三地应及时统一采取控制措施。有关控制措施包括: (1) 屠宰措施。发生疫情的农场必须立即将所有的发病牲畜或家禽用安全方法杀死并销毁, 疑似病畜或病禽有时也要一并杀死及销毁, 并对健康家禽家畜接种疫苗。(2) 隔离措施。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各地防疫机构必须立即把发生疫情的地区及临近地区设置成隔离区, 禁止家禽家畜及其制品和粪便等的流动, 对疫情的发展进行严密的监察。

此外, 三地应严格执行为家禽家畜注射疫苗, 加强抗体检测合作, 实施统一的抗体检测标准。而且, 三地应合作制定防范动物传染病的应急预案, 做好应急准备, 加强动物防疫方面的人员培训和科研工作。

对于上述三地在动物防疫方面的合作安排设想, 建议粤港澳三地政府通过积极的磋商, 将之纳入三地防控传染病的区际合作协议当中, 使三地在动物防疫上的合作规范化和制度化, 确保在该领域的合作能够长期有效地进行, 而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受到影响或变动, 共同努力以促进三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责任编辑: 许锡挥)

歌声中的合作与交融

——粤港合作演出《中国抗战声乐史诗——不屈的中华》有感

王家瑾

引 子

同唱“全民抗战”是合作的基础

2005 年 9 月 22 日晚,《中国抗战声乐史诗——不屈的中华》音乐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这是香港美声合唱团张汝钧先生精心策划,由香港美声合唱团、中山大学老教授合唱团、华南理工大学教师合唱团合作演出的。用独唱和 140 人的大型合唱的声乐史诗形式,重现中华民族的那段可歌可泣的苦难历史;颂扬中华儿女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欢呼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场音乐会还分别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清华大学、中央音乐学院演出共六场,得到很好的社会反响,尤其在香港。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在为《中国抗战声乐史诗——不屈的中华》的演出题词中有这样一句话:“以‘声乐史诗’的形式,把当年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勇抗敌、为国捐躯的伟大精神,用歌声重现舞台,传递给听众;从而大大加强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史实的艺术感染力,对海内外同胞认识历史,认识祖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笔者认为,这是准确又有分量的评价,其中包含两重意思;第一,体现“全民抗战”的理念。香港美声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张汝钧先生早在一年多前,就酝酿《声乐史诗》的提纲与选曲,历经 17 次易稿,在最初是“三团备忘”中提出“……必须是强调‘全民抗战’,要反映出伟大的中华民

族不屈不挠的抗日精神，强调民族性……”并取得大家的认同，构成了此次合作的良好开端和巩固的基础。往年香港与内地同胞共赴国难，全民共同抗战，从将领到百姓、从老人到少女，都曾留下与日月同辉的壮举；今天又有这样一群具有共同的历史感和民族感的香港爱国者，一道重温曾经共同拥有的历史，这是多么珍贵的合作。也可以说，这正是当年“全民抗战”精神的再现。

第二，依托“全民抗战”这样的共识和厚重的民族感，赢得观众。我们的演出只有取得台上与台下的合作，使音乐会得到广大观众理性的认同和感情的共鸣，这才是成功演出的基本标志与评价。

正确反思历史和尊重历史事实，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当前大力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时候，这一点更显得重要。今年开幕的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就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港澳人民及华侨的抗日事迹。“英烈馆”里的 296 名抗日英雄中，就有 140 名是来自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这样的展览以及一批珍贵的历史纪录片都在当年“既是享乐者的天堂，也是抗日战士的沙场”的香港与公众见面，这是对历史经历的“抢救”和重新感悟。因此世界反响强烈，公认我国出现对抗战史观的新视角，让所有的中华民族儿女，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认识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的真实；更可以显示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复兴，有助于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国抗战声乐史诗——不屈的中华》的历史和现代意义尽显于此。

共筑《声乐史诗》的民族魂

我们这些“没有被日本炸弹炸死的人们”，从小都会唱许多抗战歌曲，那时回荡在中华大地上的抗战歌曲据说有二百多首。这是因为那个年代像黄自、田汉、冼星海、聂耳、夏之秋、张寒晖、贺绿汀、刘雪庵、马思聪、郑律成……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词曲作家，给我们留下的动人心弦的、涌动着中华民族魂的传世佳作。

因此，《中国抗战声乐史诗——不屈的中华》的真正含义所在，就在于粤港两地文化人将这笔可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挖掘并演绎出来。不仅再现其历史价值，而且推动那些已经跨越历史时空的声乐精品，在祖国大地传唱不息。这岂不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壮举么！

我们评价一首歌曲优秀与否，离不开被广大群众的接受程度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例如，在第二篇章“中国不会亡”里，两地主持人一致大力推崇并选用了《歌八百壮士》这首歌，按原版演唱。这是 1937 年桂涛声作词、夏之秋作曲的战斗歌曲，大力讴歌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以“……民族英雄谢（晋元）团长”为首的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伟大民族精神。值得顺便一提的是，谢晋元是广东蕉岭人，在中山大学肄业后进入黄埔军校的，我们纪念他有着特别意义。

我们这代人在年少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中国不会亡……”的激昂旋律铭刻在心；1949 年之后，这首歌在大陆很少再传唱。而现在，更多的人可以从一位老人身上体会这首歌曲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2005 年 7—8 月期间，当媒体广泛报

道“当年八百壮士最后一人，年近90岁的杨养正”时，可以听到他用苍老的声音唱出这首歌中的“……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那铿锵有力的句子；还听到他通过电话与在台湾姓上官的战友之子对话时再次同唱这首歌……68年后我们重唱这首歌并再现舞台，无容置疑地说明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又如《长城谣》，这是1937年潘子农作词、刘雪庵作曲的一首优秀抗战歌曲，曾被俄罗斯作曲家当作优秀曲目选入《中国狂想曲》；香港美声合唱团应邀赴京演出时，登上长城并激动地唱起这首歌，许多游客被吸引驻足聆听和发出感叹……。

诞生于1942年的《歌唱二小放牛郎》编入第三篇章“把鬼子赶出去”，这是根据一个真实感人的敌后游击区小英雄故事，由方冰作词、劫夫作曲的叙事歌曲，过去在内地曾被广泛传唱，几乎所有的中小学生都会唱。现在当我们练习和演唱的时候，两地的演员依然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被编入第五篇章“美丽的祖国”里的《美丽的祖国》，是马思聪1947年作品《中国大合唱》的首曲。演唱的时候，台上台下的人常常激动得泪流满面。

粤港两地文化人在这次合作中，共同选用的这些抗战歌曲，说明双方找到了历史感与民族感的交合点。

《声乐史诗》的民族魂触动了观众的魂魄。在广州演出的时候，有些抗战老战士被那些强烈的音符带回那血与火的年代，使他们激动不已；在香港大会堂演出的时候，1400多观众用最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热血沸腾的激情，音乐会结束后仍

迟迟不舍离去……

艺术合作也要体现“一国两制”

实行“一国两制”，是我们引以自豪的重大国策。在这次《声乐史诗》的合作过程中，我们才经受一次实践的挑战，感受到这伟大的战略理论与日常行为的密切关系。

《祖国颂》是1959年著名词作家乔羽和著名曲作家刘炽的作品，是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一首大型合唱曲，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非常喜爱的优秀艺术歌曲。编入《声乐史诗》的第五篇章“美丽的祖国”是顺理成章的。香港的合唱团选用这首歌已充分表现出他们的爱国之心。因为要在粤港两地演唱，张汝钧先生将歌词中两处“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改为“我们伟大的民族，光辉诗篇传万代！”这一句歌词的改动，在我们这里引起了争论，给紧张的歌曲训练蒙上阴影。

我们看到，现在从我国高层领导到民间各级学术以及商业往来，在与港、澳、台的各种交往中，都是以“振兴伟大的民族精神”为基调和契合点，大大促进中华民族的振兴步伐。《声乐史诗》的总指挥、国家一级指挥丁家琳先生也对此作了解释：“贯彻一国两制，我们不能要求香港人唱‘社会主义’……因时代的发展和演出的需要改动一两句词，只要没有原则错误，是允许的，是常有的事。”何况，这一句词的改动，与原著的精神并不冲突，而且使这首歌的演唱更豪放大气、更具时代性和现代感。

在与港澳扩大交往与合作的今天，尤其在如此邻近的广州，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我们，必须自觉克服传统思维和固定思维模式的限制和影响；必须对重大国策给予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善于处理文化上的“求同存异”、“合而不同”的问题。

从一群香港人身上感受

另一种香港文化

在香港这块特殊土地上生活的“香港人”，于我们的心目中是很“商业化”、很“功利化”，其文化也是很“低俗化”的……是香港美声合唱团在南理工大学的一场《美声之夜》演唱会（2003 年 11 月），在中大的一场《动人的俄罗斯旋律》专场演出（2004 年 12 月），以及一些近距离的接触，使我们产生再认识和再合作的愿望和激情。

香港美声合唱团的成员大多出生于香港本土，其学历、职业、级别的差异非常大：有被特许“坐着讲课”的在职博士；有大小企业的老总，有些比较富有，可以住半山的豪宅；有教师，包括在智障儿童学校任教者；有医护人员，包括难得的“男护士”；有银行的高级职员和各级工程师；也有地铁公司和一般小公司的职员，以及物业公司的保安员和电梯维修工人……是什么使他们走到一起，大家平等相待，凝聚成一个能够承担大型演出任务的业余合唱集体？

是对高雅文化、合唱艺术的共同追求；是受到“既教你唱歌，又教你爱国”的张汝钧先生孜孜不

倦的教导；是不时受到前来客串的国家级大指挥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的吸引与感染，使这个团的成员对合唱艺术的了解和理解不断深化和提高。

以热衷于参加训练为例。每逢周五晚上是合唱团的训练时间，最紧张和辛苦的莫过于那些在珠三角开办企业的老板。他们在下午完成工作会议后，再乘车、船赶回香港，风尘仆仆地到训练场。有些就在本地上班的职员“啃”着面包赶去训练的事已不鲜见。

还有那些“富裕的人”，他们对合唱团的活动毫不吝啬地给予经费支持而少留痕迹；他们为这次演出，向中大和华工赠送的 42 套女士演出服，给人们留下美丽的记忆……在几个月的合作期间，有人难免要来往于广州与香港之间，为了节省本团和兄弟团的费用，他们主动邀请留宿自家，大家戏称他们家俨然成了合唱团的“家庭旅社”。记得我和两位团友被邀请时，人人都说“不可以的！香港人不喜欢别人住自己的家里。”当我们难却盛情后又发现，他们虽然富裕，家庭生活却十分简单、朴素又“很中国化”……而在参观他们的工厂时，却看到他们对工作效率和质量追求，是“很西化”、“很现代化”的……

他们集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敬业与执着，出手不凡地支持合唱艺术活动在香港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对“香港人”的印象和评价；也在很大的程度上看到我们的差距所在和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我们从中体验到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包容与融合，也为今后的交流与合作建构了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许锡挥）

港珠澳大桥与中深大桥

建设的必要性与功能互补性

郑天祥

为满足香港与澳门、珠三角东西两岸之间的文化、经济发展的需要，迫切要建设跨珠江口门到门的陆上通道。鉴于笔者曾建议的港珠澳大桥双丫方案（一桥通港深珠澳四地的方案）未被港澳主流方面所接纳，而沿海高速公路广东段属内地干线公路，过境车辆不便进出港澳，否则 10 余万辆过境车会给港澳带来尾气、噪音污染和治安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车辆途经东涌一带，空气污染已超标，不宜再增加大量过境车。

既然港珠澳大桥不能兼顾沿海高速公路的贯通作用，修建中山至深圳的大桥以接驳沿海高速公路就势在必行，剩下只是建设的时机问题。若以已建成的虎门大桥作为珠江口的第一桥，港珠澳大桥为第二桥，港澳方面将中山深圳大桥称之为第三桥，也就是期望其排在港珠澳大桥之后建设，还有人质疑第三桥建设的必要性？是否属于

重复建设？是否会大大影响港珠澳大桥的效益？笔者就两座大桥的不同功能来分析其建设的必要性与功能互补性，并提出错开建设期以避免矛盾和降低效益。

一、港珠澳大桥主要是港澳之间的通道，也兼顾香港与珠海、粤西、大西南之间的通达，甚至是未来通往东盟的大陆桥，涉及到“一国两制”不同关税区的跨境通关等问题。与港珠澳大桥相隔 50 多公里的中山深圳大桥主要是珠三角东西两岸，粤东与粤西、华南与大西南之间的大通道，是内地的一条干线通道。可见，两座大桥的功能与性质是不同的，不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

二、在运输功能上，港珠澳大桥主要肩负香港迪士尼乐园、机场与澳门博彩旅游、珠海及粤西商务、旅游度假等之间的客运，香港主流方面虽然对港珠澳大桥的货运也寄以厚望，以便提高

大桥的效益,尽快回本,以及促进在大屿山西北建设10号货柜码头。不过,这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香港10号货柜码头规划10多年了,始终没有航运界愿意投资,因为现时香港建一个货柜码头是内地投资的4~5倍,而从珠三角箱源地运一个TEU(标准箱)到欧美要比经香港中转到欧美便宜300美元,香港港口吞吐量的7成来自珠三角是因为香港港口的航线多、航班密、效率高、经香港中转可以很快下船,不用在码头、仓库久候。不过,由于香港航运界纷纷到珠三角投资建港口,建立境外作业区、仓储区,并带去航线和管理,保持了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估计,在香港境内及境外直接经营运作的箱量高达3000万TEU以上,2010年左右可达5000万TEU,是新加坡港、上海港所望尘莫及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在未来10余年内仍保持世界第一货柜港的地位,仍是珠三角港口群的龙头;同时,这将大大降低香港航运界的经营成本,并使几万家珠三角的港资企业获益,可以说珠港达到了双赢。但香港航运界是不会放弃珠三角西部已建成的一系列港口,利用“水转水”到香港比走陆路和港珠澳大桥费用低得多,尤其是大屿山不建10号货柜码头的话,珠三角西部的货柜车走港珠澳大桥到葵涌码头,还不如走虎门大桥或第三桥到葵涌码头。

中山深圳大桥则主要肩负货运,因为大桥及其延线有一系列的港口(江门港、珠海港、中山港、广州南沙港、深圳大铲湾港及西部港区、盐田港、惠州港等,)可以吸引大量的货运,喂给香港或直接出洋而珠江东西两岸的客运将主要由轨道交通承担,已动工兴建的珠三角轨道交通网A

字形主骨架(广州至珠海、澳门、广州至深圳、香港及中山至深圳中部连接线)其联接线与中山深圳大桥走向基本一致而且相距不远,但功能显然不同,轨道交通是高速客运线,而中山深圳大桥则以门对门货运为主,兼有一些客运。

三、两座大桥投资规模和效益差别大

港珠澳大桥采用桥隧方案,主桥长34公里,由于没有利用天然岛屿兴建主桥墩,需在深海区建设2个人工岛作为隧道进出口和通风口,还要在拱北建2.6km²的大型人工岛和长20多公里的隧道通过拱北建成区,使大桥、隧道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的动态投资高达600亿元以上。而中山深圳大桥,总长12公里,深水航道也采用隧道方案,由于桥长仅为港珠澳大桥的1/3强,处在河口内50公里河床和较小风力地区,不需填海建3个人工岛,投资只需60~70亿元,建设工期也可以比港珠澳大桥缩短一半以上。

不过,为了照顾香港的利益和情绪,笔者建议中山深圳大桥宜推迟到港珠澳大桥开工以后,而视虎门大桥饱和程度而定,现时虎门大桥日通过量为3.7~4.8万辆,每年约增加0.5万辆,加上轨道交通担负了客运任务,估计要7~8年后才饱和,沿海高速公路绕道走虎门大桥要多50多公里,不过却可以提高港珠澳大桥和虎门大桥的利用率。但是,即使推迟中山深圳大桥的建设,港珠澳大桥的成本高、效益低两难问题仍难化解,关键是能否利用天然岛屿。填海建人工岛会破坏珠江口的生态。

(责任编辑:周多天)

香港“产业空心化”与 “积极有限干预政策”

阮北平 危应华

【摘 要】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香港的产业结构和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并就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文章回顾了香港的产业发展历程，指出香港产业结构存在的“产业空心化”现状及其危害；比较了香港与其它亚洲三小龙国家的产业结构，指出“积极不干预政策”对经济缺乏引导及纠正，最终导致“产业空心化”；为纠正香港产业结构的偏差，提出了“积极有限干预”及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香港 产业空心化 积极不干预

1、香港产业结构的若干特点

1.1 香港产业发展经历的两次转型。1841 年英国政府侵占香港并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之时，香港基本上是一个渔农社会。到了二十世纪，因为有中国内陆作为腹地，香港的转口贸易一度获得迅速发展，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转口贸易一落千丈，经济陷入停滞。在 50 年代，由于中国内地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香港的转口贸易再次受到严重打击，这时香港的制造业却由于从大陆来的技术和资金而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60 年代，香港的工业化进入全盛时期，70 年代末达到高峰，完成了香港产业的第一次转型。而第二次转型，发生于 70 年代后期，于 90 年代的中后期基本完成，其特点是“经济服务化”。

1.2 香港各产业占 GDP 的比重。香港的产业结构经过两次转型之后，无论是从对本地 GDP 的贡献还是从就业人数上来看，第一产业已经变得十分微不足道；第二产业经过 70 年代的高峰期之后也是一蹶不振；只有第三产业变得越来越强劲。

表 1 各个产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 单位: %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合计	采矿及采石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务业	建筑业	第三产业
1980	0.9	31.9	0.1	23.8	1.3	6.7	67.2
1985	0.5	29.8	0.2	21.9	1.3	6.7	67.2
1990	0.3	25.3	0.04	17.6	2.3	5.4	74.5
1991	0.2	23.1	—	15.4	1.8	5.5	76.7
1995	0.1	16.1	—	8.3	2.3	5.4	83.8
1996	0.1	15.5	—	7.3	2.4	5.8	84.4
2000	0.1	13.6	—	5.6	3.0	5.0	81.7
2001	0.1	13.1	—	5.1	3.1	4.8	82.7
2002	0.1	12.3	—	4.5	3.1	4.7	87.6
2003	0.1	11.4	—	3.9	3.1	4.3	84.7

数据来源:《港澳统计年鉴》2000~2004 年,《香港年鉴》1990~2004 年

分析上面表格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1) 香港的经济的发展过程一定程度上符合“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认为:三大产业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主导地位的首先是第一产业,然后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最后再转向第三产业。)但也要看到,香港的第二产业很难说在某一个阶段占据过主导位置,因为即使在工业化高峰期的 70 年代末,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只有 30% 左右,而第三产业却占了 60% 多。

(2)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到 21 世纪初的这二十年时间,是香港“经济服务化”的第二次转型时期,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一直下降。在第二产业的四个主要行业中,除电力、燃气及水务业有少量的增长外,都出现了滑坡,其中采矿及采石业、建筑业的滑坡都是微不足道的,所占比重没有什么变化,突出的是制造业出现了严重滑坡,其所占比重从 1980 年的 23.8% 下降到了 2003 年的 3.9%,可见,制造业的衰弱是第二产业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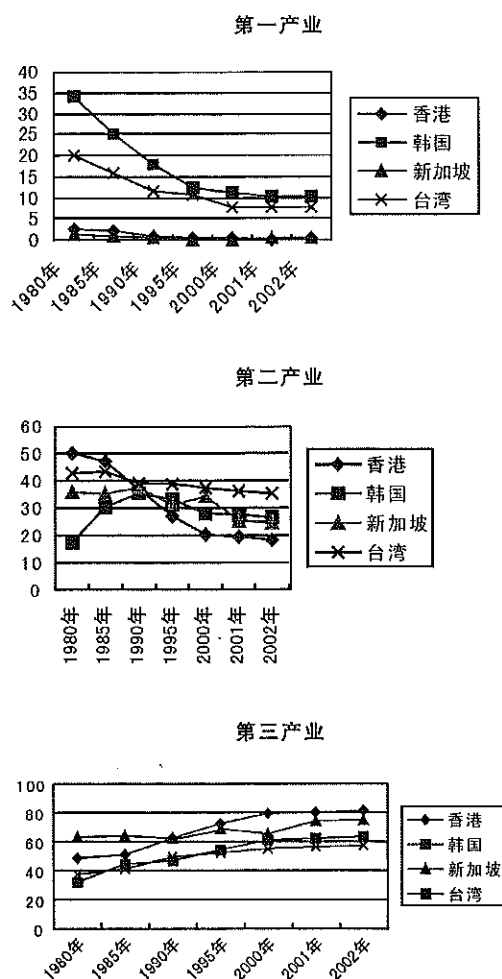
下降的直接原因。

1.3 香港与其他亚洲三小龙的各产业就业变化的比较。

由下图可以看到:香港和其他亚洲“三小龙”一样,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都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不同的是,其余三小龙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都保持在 40% 左右,而香港的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了 21 世纪初,香港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已经是亚洲“四小龙”当中最小的了。可见,相对于其他的“三小龙”,香港的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出现了“弱”的特点。

香港制造业的弱势还表现在其技术含量不高上。不仅在香港本地产业技术含量不高,纺织、玩具等轻工业在香港的制造业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就是由香港转移到内地的产业也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其余“三小龙”的相比,香港的制造业呈现出“小”,“低”,“轻”的特点,整个国民经济缺少工业经济的有力支撑,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危机。

图1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就业构成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6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2004年

2. “产业空心化”对香港经济的危害

2.1 “产业空心化”使香港整体经济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增长源。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主要依靠外部需求时,要想维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拥有一个高效灵活的工业经济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当今世界,虚拟经济不断膨胀,泡沫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质性的基础——工业经济,拥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源,显得尤为重要。而香港“产

业空心化”危机的出现使香港的整体经济失去了很重要的增长源,其具体表现在近几年来香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慢于亚洲其他地区。

2.2 “产业空心化”使香港就业机会萎缩,失业加剧。一般来说只有工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才可能为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不需要太多专门技术和要求的就业机会。香港制造业的持续低迷和内迁,使香港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有攀升的趋势。1998年香港就业人数343万人,其中工业就业人数仅为25.7万人,约占8.5%,而同期失业率达5.7%,1999年失业率更是达到6.1%。不能不说“产业空心化”使香港的就业情况变得艰巨了。

2.3 “产业空心化”增强香港经济不稳定性。工业始终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的稳定器,尤其是对外开发度极高的自由港的体制,只有工业经济发展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阶段,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增长源。事实上,第三产业发达的经济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做后盾,对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就会很敏感,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国内经济就开始动荡不安。

2.4 “产业空心化”的危机最终会影响香港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一个发达的服务业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的基础上,只有制造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服务业才有可发展的空间。我们知道服务业中比较高级的就是“生产性服务”,可是如果连生产都没有,又何谈“生产性服务”呢?或许说目前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合作模式就可以让香港可以没有第二产业,但应该看到,这种合作模式本身就有许多的局限性:如珠三角地区最近出现了“民工荒”,这从另外一个

角度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生产成本的上升；更有甚者，一些珠江三角洲的内地企业正成为香港厂商的强大竞争对手。这样看来，这种合作模式就目前看来不是稳定的，香港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工业支撑。

3. 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对“产业空心化”的影响

发展经济学家推崇政府在本地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香港政府一贯奉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产业乃至经济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1 “积极不干预政策”使经济转型随机发展。80 年代以来，在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氛围下，香港的银行、保险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制造业大规模内迁，经济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以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在此情况下，香港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致使香港工业相对于其他“三小龙”，呈现出“小、低、轻”的特点。而台湾、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期间都制定了很明确的发展战略和应对措施，引导经济转型，而不是任由其随机性的发展，最后这两个地区科技都取得长足进步，顺利实现了重工业化。

3.2 “积极不干预”使高科技产业缺乏政府的扶持，科技力量薄弱。

高科技也就意味着高风险、高投入，而一般的企业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在香港，能承担高风险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积极不干预”政策使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无所作为，尽管 90 年代以来香港陆续建立应用研究发展基金、实施“自动

化计划”、科技工业中心等一些发展科技的项目，但投资力度明显不够，还规定种种限制，收效甚微。相比之下，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政府从 92 年起实施“公司研究优惠计划”资助民间研究机构。据官方公布，到 1996 年，新加坡用于 R&D 的总支出为 13 亿美元，比 1991 年增长了 75%，其中私人企业的投入占到 2/3，可见政府对民间科技研究的引导和资助政策卓有成效。进入 21 世纪，新加坡又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据政府预测，在 2000 之后的 5 年内，全国用于 R&D 的总支出将达到 110 亿 - 120 亿新元。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使香港的产业科技水平和新加坡的差距明显，香港的科技力量相对薄弱。

3.3 “积极不干预”政策在坚持自由经济的同时，也使自由竞争的环境受到挑战。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的“不干预”对于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非常有利，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根据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一些行业慢慢出现了大利益联合集团，如果政府不进行有效干预，就会形成垄断。如香港的房地产行业已形成了由 10 个财团控制的局面。这些垄断财团的出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可避免的要求香港政府加强干预力度，控制垄断、保护竞争。

3.4 “积极不干预”政策使资源在投机因素影响下集中于暴利行业，导致“产业空心化”。从 90 年代初到回归前夕，由于政治上的影响和市场的盲目性，市场资源在投机因素影响下向暴利行业集中，社会资源有很大部分都投向了诸如房地产、股票等暴利行业，而对于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投资却一直下降。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

香港政府,一方面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或手段引导市场回归理性,变投机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另一方面,甚至出于政府财政的考虑,还在此期间大量向外界批租土地,加剧了房地产泡沫的增长。

3.5 “积极不干预”政策对香港“产业空心化”的影响

因为在政治上的依附性和经济上的外向型,香港选择了“积极不干预”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成就了香港“自由港”的美誉,另一反面,在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出现偏向时,政府干预的缺位使得经济缺乏必要的引导。正是香港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这种“积极不干预”政策,不能引导已经“迷途的羔羊”找到回家的方向,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导致经济的脆弱。

4. 纠正“产业空心化”的政策建议——“积极有限干预”政策

4.1 “积极有限干预”的界定

“积极不干预”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香港“产业空心化”危机。为解决“产业空心化”危机,港府应调整产业政策,实施“积极有限干预”政策,即保持原有的“积极”,如积极为贸易提供各种服务等,而将放任产业自由发展的“不干预”政策调整为“有限干预”。也就是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来的自由港的特色,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利用产业政策在宏观上引导和扶持香港产业的发展。

4.2 “积极有限干预”政策的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经济体是真正实行亚当·斯密的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或多或少都

有政府的积极参与。“积极不干预”的主旨是“不干预”,是放任自由,而“积极有限干预”的意思就是强调港府在某些方面要加强干预。

4.2.1 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性计划,实施长期的产业发展战略

政策性计划是根据对国民经济的综合预测而制定的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经济政策体系的总和。在国外有很多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通过正确运用政策性计划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现了经济的跳跃式发展。正确制定和运用这种计划,是不可或缺的,既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经济贸易的自由度,又可以协调、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具体方式之一。因此,港府应该根据香港的经济状况制定适时的产业发展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4.2.2 政府应加强产业发展研究,制定相对积极的产业政策

香港的工业要发展,主导产业的选择是关键。目前很多研究机构的报告中对于香港发展高科技有一些想法和思路,但没有真正可供参考和作为根据的研究出台。香港要想发展以创新和科技为主导的产业体系,首先应加强产业发展研究的力度,做好基础研究,其次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合乎实际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然后按规划的要求实施,或给予财政的支持,或提供更多的优惠,这样的发展思路往往能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比如制定相对积极的产业政策,鼓励和引导主导产业健康发展,应对发展创新科技的企业提供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推动科技产业化发展。同时,还应积极吸引内地和国际高科技企业来港投资,

带动和培养本地的高科技发展。

4. 2. 3 政府在工业发展和服务的机构方面, 应该做适当调整。

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中的“积极”, 主要体现在香港当局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服务, 在服务机构设置方面既有统一领导的对外贸易机构: 政务司署工商科, 又有半官方机构: 贸易发展局, 还有众多的民间团体: 香港总商会等。但在为工业发展服务的机构方面, 却有限而且凌乱, 如果能调整并成立一个由特区政府直接领导、直接对港府负责的机构, 统一研究、制定计划并监督实施的促进工业发展的机构, 会比较有效。这样既有利于统一领导, 又可以避免机构重复、效率低下的情况出现。符合香港“大市场, 小政府”的机构架设理念。

4. 2. 4 加大 R&D 的投入及高科技人才培养, 推动高科技发展

香港产业结构未来的转型方向应该是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科技的发展需要 R&D 的高投入, 由于香港原有工业呈现“小、轻、弱”的特点, 基本没有大企业, 小企业难有资金投入高科技研发, 缺乏产业发展和升级的领头羊——大企业, 这就需要政府来推动高科技的发展。

目前, 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只占 GDP 的 0.1%,^①, 韩国和台湾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多年来都远远高于香港, 香港要想发展高科技就得奋起直追。政府应舍得加大 R&D 的经费投入, 尽快提高 R&D 的经费在 GDP 中的比重。港府近年来对高科技的投入还是有所增加的, 如 1998 年董建华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拨款 50 亿港元成立“创新及科技基金”, 这项拨款相当于当年港英政府成

立科技中心拨款 (2.5 亿港元) 的 20 倍。

推动高科技的发展还需要有各种配套服务, 如需要高水平的研究机构和高效率的管理机构, 这就需要大量素质高、具有开拓精神的人才。港府应注重培养本地工业和科技人才, 同时积极引进内地和全球高科技人才, 特别是制定政策吸引华人高科技人才和企业家来港创业。

参考文献:

1. 张敦富, 区域经济学原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01
2. 冯邦彦, 香港产业结构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10
3. 王鹏, 韩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比较分析, 亚太经济, 2001. 02, 72-75
4. 郑佩玉, 李开云主编, “九七”后香港经济社会研究 [M],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2. 04
5. 黄少军, 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变动及启示, 特区经济, 1996 年第 6 期, 49-52.
6. 王建民, 刘求实, 香港与亚洲其他“三小龙”产业结构比较初探, 清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7. 第 12 卷. 第 4 期, 70-75.
7. 周炼石, 政策性计划: 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3, 04, 113-123.
8. 张晖明, 丁娟, 论技术进步、技术跨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复旦学报 (社科版), 2004 年第 3 期, 81-85, 93.
9. 尹翔硕, 对亚洲四小龙贸易发展战略的再认识 - 香港地区与韩国比较, 世界经济, 1997 年第 6 期, 37-41.

(责任编辑: 论文章)

^① 而美国是 2.5%, 新加坡也是 2.5% 《田长霖: 港应发展高增值产业》, 香港《文汇报》, 1999. 1. 13, A2 版。

自由行

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周余辉

31 言

2003 年非典疫情解除后, 为了支持香港经济复苏, 应特区政府的要求, 中央决定开放部分省市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 港澳地区简称“自由行”或“个人游”。根据这项政策, 内地居民只需提交个人身份证明便可向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来往港澳通行证》及签注, 进入港澳地区旅行。2003 年 7 月 28 日, 广东省东莞、中山、江门和佛山 4 个城市居民以个人身份赴港旅游首先启动, 这标志着香港在内地实施了 50 多年的除了公干外必须以“团进团出”的访港办法已经结束。随后自由行试点扩大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珠海等大城市, 2004 年 7 月扩大到广东全省及江苏、浙江、福建的 9 个城市, 这标志着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入港旅游成为可能。

一、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有利影响

自由行不仅拉动了香港旅游业的迅速增长,

加快了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步伐, 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现实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自由行”使香港的旅游业迅速复苏

受疫情的负面影响, 作为香港支柱产业的旅游业, 在非典期间突然萎缩, 但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的实施, 又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的数字显示, 2004 年访港旅客创 2180 万人次的纪录, 同时为香港带来 918 亿港元的“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开支”, 其中内地的游客为 1225 万, 占了访港旅客总数的 56%, 在推动香港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仅“五一”黄金周就有 38 万个人游旅客抵港度假, 给香港带来了 24 亿港元的旅游收益。

2005 年 9 月开幕的香港迪斯尼乐园, 也会因自由行给香港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据香港特区政府估计, 迪斯尼乐园开业第一年约能吸引的 700 万游客中有 200 多万来自内地, 并且多是来自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他们的高消费能力会

给香港带来不菲的旅游收益。还有正在建设中的东涌吊车系统和亚洲最大的湿地公园也会吸引广大的内地游客。

2. “自由行”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迅速发展

自由行实施后,拥有高消费力的内地居民涌进香港,带旺了香港的酒店、饮食等相关行业,推动了香港整体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

2003 年 5 月份香港的酒店入住率为 18%,11 月份达到了 90% 左右,2004 年的平均入住率

达到了 86% 以上,这与自由行的推动是分不开的。“非典”期间,香港零售行业特别受到严重的伤害,大小商户的营业额几乎为零,只能歇业。随着个人游的推出,拥有高消费能力或难得一到香港的内地旅客,均可来港观光旅游,香港具质量保证的货品,更是他们的“狂扫之物”,香港零售业也因此获得重生。由下表的数据就可以看出:自由行推出后,香港的饮食与零售业收益呈直线上升。

表 1 香港饮食与零售业的收益

单位:百万港元

年 份	饮食业		零售业	
	数值	年变动百分率	数值	年变动百分率
2002 年	53, 371	- 5. 4	176, 859	- 4. 1
2003 年	48, 172	- 9. 7	172, 863	- 2. 3
2004 年	53, 037	10. 1	191, 612	10. 8
2005 年第一季	13, 812	6. 1	52, 124	10. 4
2005 年第二季	13, 391	4. 5	51, 186	7. 4

资料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 (www. info. gov. hk)

3. “自由行”使香港股市创下多项新高

自由行的实施,使香港股市一路攀升。2003 年,香港股市总成交额达 2. 5 万亿港元;证券市场总市值达 5. 5 万亿港元;港股总集资额全年达 2090 亿港元。2004 年则更加红火,指数连续高升,成交逐日增加,8 月份的日均成交额高达 113 亿港元,全年总成交额达 3. 8 万亿港元,较 1997 年的历史记录还高 39 亿港元;截至 2004 年 12 月 2 日,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达 6. 6 万亿港元,冲上历史高位;港股总集资额全年可达 2800 亿港元,仅次于纽约,位居全球各证券市场第二。

有业内人士表示,2004 年香港股市如此活跃,成交额激增,与内地开放个人游有关。香港资本市场是内地炒家觊觎已久的地方,不仅交易品种齐

全,股票、期货、外汇、保险等应有尽有,而且个人财产也受到法律严格保护,这对有相当积蓄,但在内地乏力的资本市场上无所作为的内地居民来说,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大福证券执行董事李耀荣表示,该行多年来共累积内地客户达数千人,为总客户人数的一成,内地客户再次活跃,相信主要与内地开放个人游有关。

另一家本地证券行时富投资执行董事罗家健认为,内地增加开放个人游城市后,游客来港买卖股票最终会成为趋势。他表示,香港是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无论外国人或内地人来港开户买卖证券,只需提交其身份证明文件,都可以成功开设户口,这就大大便利了内地旅客来港买卖股票。随着个人自由行的开放,内地热钱将有可能大量流入香港股

市。

4. “自由行”令香港逐渐向离岸人民币中心演化

依据国务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测算方法,以 2004 年内地访港旅客 1225 万人次计,假设每人每次按规定平均携带人民币 6000 元,由内地旅客带入香港的现钞人民币就达 735 亿,而 1996 年到 2004 年内地旅客带入香港的现钞人民币总量则达 2763 亿元,假设每年流入香港的人民币 1/3 沉淀在香港,则目前在港较为稳定的人民币现钞就超过 921 亿元,考虑到内地旅客每次携带的人民币往往超过规定,实际沉淀在香港的人民币可能远大于 1100 亿元。

面对着几百亿元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香港银行却爱莫能助。目前,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基本上处于银行体系之外,这种半地下的流通状态没有解决人民币流出并安全回流内地的关键问题,而大规模的人民币体外循环状态既增加人民币在香港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也不利于国内央行的监管。这无论对内地与香港两地货币管理部门,还是对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来说,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些人民币纳入银行体系,这就要求把香港建设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为了规范人民币在港流通,香港特区政府、香港金融界早就有心在香港开展人民币业务,并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2004 年 2 月 7 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港宣布开始试办个人人民币的存汇兑换业务,中银香港成为结算行。这一业务的启动,预示着香港向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立更迈进了一步。虽然香港要成为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如足够的人民币流量,中国资本帐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等,但可以相

信,随着自由行的进一步开放,沉淀在香港的人民币流量会更加庞大,而香港作为国际的金融中心,在试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完善监管制度,积极协助人民币走向世界,在条件成熟后,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二、自由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个人自由行的推出,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全面复苏,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加快了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步伐,但自由行还存在以下的问题:

1. 内地人士借机来港洗黑钱

据香港报纸报道,香港对中国内地游客开放个人游,不但带动了旅游及零售业,更有个人游豪客买入多栋物业作投资。2003 年一内地旅客在港期间斥资 264 万港元,购入五个住宅单位做长线出租;还有内地商人一掷 1380 万港元,购入香港荔枝角道一家商铺,作为投资用途。这些现象已引起社会各界对洗黑钱问题的关注。地产发展商认为,由于难以断定买方是否以黑钱买楼,即便他们对此有忧虑,也无从防范,惟一的方法是尽量要求对方转账或支票付款。

自由行推出后,香港股市相当活跃,成交额激增,据估计差不多有 200 亿的内地资金流入香港股市,其中不排除有黑钱的流入。由于内地人士来港开户较为便利,而一些银行也为内地资金流入香港大开绿灯,使得内地人士通过香港股市洗黑钱成为可能。一投资香港股市的内地人士告诉记者,香港某著名外资银行对其客户所开展的一项业务“在向境外汇款方面非常方便”,通过这家银行提供的这种服务,内地人士完全可以通过设立多个户头化整

为零地将内地的一笔外汇资金很顺利地汇到香港。

2. 地下活动空前活跃

随着自由行的逐步展开,一些不法活动也空前活跃,突显的主要有“地下钱庄”和“地下保单”的问题。由于国家明文规定,出境者只能按国家汇率以人民币购买定量的外汇,但是更多人希望突破这一限制,换入更多外汇,因而在深圳等地,“地下钱庄”非常火爆,尽管其外汇“黑市价”明显高于国家当日规定的外汇牌价,但其生意却有增无减。他们主要通过携带的方式把大笔资金送过境外,或是通过货币走私和贸易转账。此外,香港的保险业也利用这一商机,大肆向内地消费者推销寿险保单,有些甚至违规推销“地下保单”。有报道指出,越来越多的内地游客开始热衷于买香港的保险,香港每年400多亿港元的保费中,约有1/3来自内地,达120亿港元,“地下保单”的规模已经占到了全国个人寿险收入的10%左右。

3. 商家服务素质较差

香港文汇报曾发文指出,特区政府、旅发局及相关行业,为配合“个人游”实施,做了大量工作,值得肯定,但也要看到“个人游”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黑店宰客、乱写收据欺客的现象屡禁不绝;个别不良商家以次充好、抬价欺客的事,仍时有发生。这些商户的欺诈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旅客对香港的美好印象,使他们不敢在香港消费,更会打消再次来港的念头。

4. 城市环境有待改善

为建立危机意识,确立香港旅游的未来发展方向,香港中文大学去年对310名来自内地的个人游旅客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7.1%的旅客认为香港的食肆卫生环境很差,44.2%的旅客认为香港的空气污染严重,63.5%的旅客认为

香港交通非常拥挤,这说明内地旅客对香港的环境评价不高,香港政府应努力改善城市环境,提高旅客的满意程度。

三、对香港政府应对措施的建議

可以看到,在自由行给香港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香港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一方面应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改善游环境,另一方面还应看准对内地旅客的卖点,加强旅游资讯推广,放宽来港旅游限制,才能使自由行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具体来说,香港政府可以考虑如下的应付措施:

1. 加强金融监管,规范人民币流通

内地体制尚不完善,在开放过渡时期里实施不排除存在灰色地带。放开个人来港投资限制,也有可能引发洗黑钱活动,导致大量资金外流,冲击内地金融体系。因此在个人游火爆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热钱涌向香港的背后,金融监管问题突显,规范人民币流通的问题变得迫在眉睫。基于此,香港应建立健全的金融机制,在银行及会计等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监管,此外还应与内地有关方面紧密合作,加强防范,以消除内地有关当局的戒心,推动对外投资开放顺利实行。

2. 加强旅游资讯推广,增加多种服务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香港旅游界应加强旅游资讯推广,在内地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上作专题,介绍香港在购物、饮食、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特色,以增强香港对内地旅客的吸引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各种服务来满足旅客的需求:如鼓励香港赛马会与旅行社合作,推出专为游客而设的“马场游”服务,包括门票及马场内各食肆的优惠

券、购买纪念品的折扣券等；还可以设地区旅游穿梭巴士服务，由关口接至各主要旅游区。这类巴士服务的特点，是设计线路除了包括该区著名胜地之外，还经过其他各具特色的步行街，通过这种巴士服务，带旅客到非主流的消费点，吸引他们在港享受不同的休闲乐趣。

3. 提高服务素质，发挥国际化特质

针对个别商家以次充好、欺诈旅客的问题，港局应考虑尽快立法，进一步保障内地旅客在港的消费权益，以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另一方面，业界要采取措施加强自律，肃清零售业的“害群之马”，提升与旅游相关行业的服务素质，令内地游客宾至如归。此外香港零售业还应加强销售产品的国际化特质，不断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品牌、饮食及纪念品，增加产品的价值。

4. 加快旅游景点建设，美化整个城市

为配合旅游业发展，香港旅游界应加快旅游景点建设，发掘更多的特色活动。港府在新的旅游基建上作出的巨大投资固然必要，但也不能忽视对香港整个城市的美化工作。与团体定点游不同，“个人游”旅客一进入香港就散布到每一个角落，如果他们在热门旅游、购物点一转身，进入附近后巷旧街，便是破败邈遏的景象，会使旅客对香港的形象大打折扣。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大型旅游设施外，对整个城市的美化工作也应提上日程。香港应像巴黎等著名旅游胜地一样，整个城市都靓丽、整洁，充满着温馨情调，这样才能保持独特的魅力。香港市民也要继续发挥好客精神，扮演“旅游大使”的角色，争取做到“人人皆景、处处皆景”。

5. 将空置居屋改建旅舍，增加酒店建设

自由行推出后，香港的内地旅客大幅增加，节假日酒店供不应求。要短期内解决香港酒店的供应

问题，政府可以考虑更改空置居屋用途，出售予酒店经营者改建成提供基本住宿服务的旅舍。另一方面，香港应加快酒店的建设，以方便迪斯尼开幕后短期内迅速涌入香港的旅客。这方面香港业界已经在努力，据估计，2005 年下半年香港约有 5000 间三至四星级酒店客房落成启用，这将极大地缓解酒店供应紧张的局面。

6. 简化入境手续，增辟新的口岸

为方便更多的内地游客来港，香港政府应尽早策划其他措施，以配合与开放个人游同时推出。并需要在适当时间检讨有关安排的反应，争取将放宽计划推广至其他城市，进一步扩大内地旅客市场，令本地旅游业及其他相关行业受惠。政府在简化出入境手续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改善过境设施，增辟新的口岸，以应付日益增加的“个人游”旅客，为他们的入港旅游大开方便之门。

参考文献：

- 1、《港澳统计年鉴》，2003 / 2004 年
- 2、张锐：《人民币离岸的香港迷雾》，《大地》，2003 年，第 24 期
- 3、陈可焜：《与内地经济融合的新里程碑》，《香港经济导报》，2004 年，第 4 期
- 4、朱践麟：《内地资金是如何进入香港股市的》，《沪港经济》，2003 年，第 10 期
- 5、中银香港：《自由行对内企与香港的作用》，2004 年 10 月
- 6、白冰：《香港旅游业要居安思危》，新华网，2004 年 11 月

(责任编辑：周多天)

论群防群治在珠三角犯罪治理中的作用

黄 琪 郭天武

一、珠三角地区犯罪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近年来珠三角犯罪剧增，笔者认为有如下的主要原因：

(一) 主观原因

从主观上，任何犯罪行为都是犯罪分子在一定的犯罪意识支配下实施的违法行为。珠三角地区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特别是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渗透，致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日益脱节，反差越来越大。同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很容易造成物质与精神的失衡，导致整个社会物质繁荣的同时，社会道德功能日益衰落，公民责任义务意识淡薄，社会成员的不良“物欲”迅速滋长，功利性价值取向强化和政治冷漠心理不断扩散，这些都对人们主观形式产生日益严峻的冲击，并对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犯罪形势产生潜在消极影响。

(二) 客观原因

从客观上说，(1) 珠三角城市的高度集中性与开放性提供了犯罪的机会，高度密集的人口、活动、技术、信息，以及开放性所带来的城市的社会流动性增大，使珠三角成为诱发犯罪的物资和潜在的被害人高度集中的地方，(2) 珠三角的地理环境提供了犯罪的空间，珠三角毗邻港、澳，交通方便，作案后逃窜容易，且城市中大量出现的高层建筑，使人们的生活视野受阻，助长犯罪的空间大大增加。(3) 人际关系淡薄，居民之间互不关心，对居住的观念淡薄，形成了城市居民对犯罪熟视无睹、姑息放任，熟人监视网无法形成，从而为犯罪提供了社会环境。(4) 珠三角地区社会人口复杂，外来工多，犯罪高频率的发生，提供了犯罪的文化环境，使一部分人容易从周围的社区环境中受到犯罪行为、犯罪手段的亚文化熏染，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群防群治在珠三角犯罪治理中的作用

群防群治的确立有其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这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结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表现为一元的社会结构: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市民社会淹没在政治国家之中,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的分离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完成的,这种分离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只有国家的存在,社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国家垄断了对犯罪行为的控制,群防群治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古代的“奖励告奸”“十户连坐”制度,仅是百姓执行政府的指令,不过是政府权威的体现,不能认为就是一种群防群治。

到了近现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并对政治国家形成制约,以防止国家权力侵入私领域,在二元化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具有独立于国家的主体地位,在公共领域之外的私领域发挥着作用,并能够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和执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制约。国家和社会都遵循法律,由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那样,国家更多的是执行法律,同时犯罪行为也更容易在更大程度上侵犯和威胁社会的利益,而不再仅仅是国家的利益,所以社会与民众具有参与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积极性,并且也具备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当今世界各国面临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犯罪数量的增长之间的矛盾,此矛盾的解决仅靠国家独立进行是不够的。综上,在这种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中,群防群治也就具有了存在的

理论和现实基础。

(一) 预防犯罪的作用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曾指出:“预防犯罪要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这段话对犯罪预防之重要性作了精辟地概括。诚然,犯罪预防可以说是整个刑事法科学(尤其是犯罪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有效控制犯罪的重要策略思想。社会中只要存在犯罪现象,就必然存在对犯罪预防的需求。犯罪预防可以分为积极预防与消极预防,所谓积极预防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把社会规范输入到社会成员的主观世界中去,“从心所欲不逾矩”。消极预防则是等社会成员偏离社会轨道,做出各种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之后,才采取措施,纠正越轨、犯罪行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社会秩序的积极预防的成本,要大大低于对违法犯罪消极预防的成本。任何制度的运行都是有“成本”的,犯罪预防制度的运行也是有成本。犯罪会给受害人与社会造成损失,还有如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失、安全感的失落以及社会道德的失去等无形损失,积极预防可以减少无形损失,从而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

同时,从珠三角地区犯罪形成的原因来看,犯罪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到家庭、邻里、社区环境,社会制度和体制,社会风气的好坏,社会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等各个方面,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正是通过这些机构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建立起强大的“犯罪免疫系统”。但是,从目前珠三角的犯罪情况来看,犯罪免疫系统功能紊乱,抑制犯罪的社会机制不断恶化,仅

仅依靠国家的宣传教育与打击无法达到积极预防的目的,最好的途径和方式就是通过社会群体的力量——即群防的措施,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认识和掌握社会的价值标准和公共行为准则,在全社会建立起预防犯罪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形成整个社会健康发达的犯罪社会免疫系统。

1. 群防群治通过社会对主体的社会化的教育,从内因上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对个体进行教育,实质在于把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主观信念和道德修养,这实质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青少年时期是对人一生影响最大的时期,因为这时他们心智还不成熟,必须从他们所依赖的人那里接受社会文化、培养一定的社会角色,形成独特个性,主体道德体系与良心,在以后的社会行为中,当人们要进行某种不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行为时,这种内在的道德体系和人格良心就会在内心发挥作用,阻止人们从事越轨、犯罪活动。所以,良好的学校、家庭教育在预防犯罪中起到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预防青少年走向犯罪的道路是有特殊意义的。一项针对广东省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调查表明能否接受正常的学校、家庭教育,对防止他们走上违法犯罪之路极重要,这些被关押的少年犯中,有旷课逃学经历者占据 84%,离家出走者占 62.2%,由于各种原因不在学校读书,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占 43.17%。可见,大部分没有受到家庭、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随着现代社会变迁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尤其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珠三角地区,各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融合更加频繁,新

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因此,成人的教育也十分重要。成人以后,接触社会最多的是工作与社区的环境,其对成年人隐含的教育作用绝不可忽视,珠三角地区由于特有的“民工潮”机制,出现了一些进城民工群落,形成都市中的“民工村”,他们实质上已经成为城市中的特殊社区。这些社区的居民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社会风气一般比较差,容易形成一种不良的社区环境,从而导致对主体不良教育,最终导致社区内的犯罪率大大高于其他社区。在某市犯罪青少年的居住环境调查中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人居住在环境混乱的社区中,当地经常发生吵架、骂街、酗酒或其他不良行为。有 1/4 以上的罪犯的邻居中也有因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所以,从“群防”的角度,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建立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社区的良好教育机制,有利于从内因上抵制犯罪,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这是从根本上根除犯罪,建立犯罪免疫系统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途径。

2. 群防群治通过对主体的行为产生社会标定的作用,从外因上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社会标定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社会评定,将某些社会行为评定为越轨行为和犯罪行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是十分注意在微观社会交往中感知周围的人际关系和周围的人对自身的评价,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面子”问题。所以,通过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对越轨犯罪行为进行强烈的批评、指斥,通过广泛的舆论指责,在犯罪人周围形成一种强大的环境压力场,造成对犯罪人的精神心理负担,从而

使犯罪者在这种压力下放弃犯罪行为,回到社会正常的行为模式上来;另一方面,通过吸引所有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标定过程,使一般社会成员更进一步认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形成普通社会成员对犯罪行为 and 犯罪成员的否定性评价,感觉到整个社会对犯罪行为的否定态度,有利于巩固社会成员的法制观念,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正是通过这种群众压力、群众舆论的“群防”措施,从外因上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目前,珠三角地区犯罪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淡薄,从而无法形成一种社会公众的谴责压力与熟人网监督,所以,重建这种压力体系,加强群防群治措施对于预防珠三角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二) 改造犯罪的作用

对罪犯改造,使罪犯复归社会是其自我转化和外界教育的共同结果,自我转化是内因,是主导,刑罚只是促其转化的外因。过去,国家往往过于重视从刑罚的角度改造罪犯,认为刑罚是对犯罪人的报应,行为人的罪行多重,就应有多重的刑罚与之相适应,即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在此思想的影响下,国家往往重视刑罚的威慑功能,而忽视了教育的功能,忽视了利用社会的力量,为其自我转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即“群治”的作用。事实上,为了达到减少犯罪的效果,实现使犯罪人回归社会这一目的,仅仅依靠国家的作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发挥社会参与的力量和作用。因为,国家刑罚代表的是一种强制性,对犯人是一种威慑,以促使其好好改造,是一种

外因。更为重要的是对犯人的教育和矫正,促使其尽快社会化,从内因上使其自我转化,而对犯人的教育和矫正,无论国家承认与否,社会群体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只要不是被剥夺了生命,罪犯最终是要走向社会,融入社会的。所以,对社会群体的合理引导,建立“群治”的制度,将国家的威慑与社会群体的教育和矫正结合起来,共同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真正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

1. 从改造的途径来看,群治有利于采用多种方式对罪犯进行有效的改造。

近年来,随着珠三角地区社会治安严峻,犯罪率不断攀升,监狱已人满为患,警备力量不足。在监狱的管理每况愈下的情形下,为防止交叉感染和监狱亚文化的影响,在用刑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加进社会的力量十分必要。同时,因犯人犯罪性大小之程度以及犯罪性形成之过程等均各有不同,故各个犯罪人矫治其犯罪性之需要亦因人而异。因此欲期对犯罪人所为之处遇能真正的发生改善之作用,须依个别化之原则。从刑罚个别化的角度出发,就应针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处遇措施,对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人采取诸如监禁、剥夺生命等严厉的刑罚手段,对人身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人,主要是对那些罪行轻微或年龄不满 18 岁的少年犯,采取社区矫正等非监禁的社区处理措施,如社会帮教小组等社会力量来承担,从而有针对性、人道性、有效地改造犯罪。

2. 从改造过程来看,群治有利于对罪犯进行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是为了使罪犯从过去错误的价值观,是非判断的误区中走出来。这一过程,除了改造机关要做大量的工作,也需要家庭、朋友、工作单位、原来学校、社区组织等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其思想工作。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对于陌生人,每个人都首先是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对于罪犯来说尤其如此。所以,改造机关人员对其做思想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而亲属、师长、朋友、社区组织负责人等对其来说都是熟人,有些甚至是其尊敬的人,由他们去做罪犯的思想工作,去感化、教育罪犯,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对于目前珠三角地区来说,由于犯罪主体主要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对于一个新的地区往往会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与不信任感,对他们而言,发动社会的力量——家庭、朋友、社区组织的力量对其进行改造,尤为重要。

3. 从改造的效果来看,群治有利于使罪犯尽快融入社会,实现社会化的改造。

改造的理想效果是要达到使罪犯实现社会化的复归,使其重新接受社会文化和规范的约束和控制,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的工作轨道上来。目前要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环节是重新安置工作与适应新的生活。但是,由于年龄大,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等主体素质的制约,就业较为困难,生活没有出路。加上,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鄙视,很容易使这些人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从以上珠三角犯罪原因分析看出,珠三角城市的高度集中性,是诱发犯罪的物资和潜在的被害人高度集中的地方,这就更容易给失业刑释人员提供机会,重新走上邪路。广东省历年调查均表明,

失业者的重新犯罪率远远高于已就业的刑释人员,但是,社会安置工作是公安劳改单位所无法完成的,必须由社会力量来完成,包括劳动部,社区组织等共同努力,通过类似社区服务、社区培训,帮助其掌握技能,重新就业。同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对犯罪人员的观念的转变,不再歧视对待,给其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 打击犯罪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转型加剧,我国的犯罪形势也一天比一天严峻,社会治安不断恶化,刑事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大案要案比例迅速增长,尤其是团伙作案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居民公共安全感不断下降。但是,我国普遍存在警察数量不足,经费、物质装备、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严重缺乏。所以,仅仅靠公安公安部门已经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才能从根本上使社会治安环境好转。

转型时期犯罪率上升是普遍现象,西方发达国家曾同样遇到现代化进程中犯罪浪潮的冲击。起初,它们采取大幅度增加警力和刑事司法投入,以打击为重点,以警察垄断治安治理为特征的防治战略,但效果并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犯罪学界提出了环境预防论和社区参与预防理论。20 世纪 60—70 年代确立了根植于社会,以民众参与为基础的“社区警务”战略,开始了第四次世界警务革命。数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社区警务”的普遍实施有效地遏制了犯罪上升的势头,收到了明显效果。经验表明,社区是防治与打击犯罪的基地,是警察力量的源泉,动员、整合社区力量和社区资源打击犯罪,是有效治理

犯罪的根本途径。

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打击犯罪,是对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借鉴。对于珠三角地区来说,其警力严重不足,而其犯罪的组成又以团伙作案为主,打击较为困难;犯罪以流窜为主,加上珠三角便利的交通,使得抓获罪犯的难度增大;高智力犯罪多,犯罪心理动因复杂,导致犯罪隐蔽性强,不易被侦破。所以,打击珠三角地区的犯罪尤为需要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群防群治才可能从根本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三、取措施,充分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

(一) 预防性措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建社区熟人体系

珠三角地区由于毗邻港、澳,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冲击,导致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发生深刻变化,传统道德规范的作用日渐式微,使整个社会的犯罪免疫系统发生了严重的功能紊乱,也使犯罪的社会性控制机制严重弱化。所以,加强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对从根源上预防犯罪具有突出意义。要把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必须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观念教育,通过家庭与学校单位、社区等群众的力量完成。道德品质教育就是要人们接受社会公认的是非与善恶等行为评判标准,自觉遵守社会行为的公共准则。尤为关键的是家长与师长的言传身

教,社区的宣传灌输;法制宣传教育,就是要人们知法守法,树立牢固的法制观念。可以通过从小学开始,学校增设法制教育课,以及广播电视的法制教育节目的宣传等措施来加强。只有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观念教育,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法制观念牢固了,才会自觉地抵制各种犯罪,杜绝各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现代都市人际关系淡薄,邻里之间互不往来,彼此陌生,很难形成熟人监督体系;同时,邻里之间不能互相关照,“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使犯罪分子更容易得逞。因此,重建社区熟人体系,形成守望相助,情感交流,扶危济困的社区环境,有利于对犯罪的根本预防。把城市居住区划分成不同的社区,为方便管理,社区的规模不宜过大,可以在社区中设立文化娱乐室、心理辅导站,增进人与人关系;同时,在社区中建立调解委员会,及时处理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的民事纠纷,避免由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通过人民群众自己管理、教育、约束自己的有效组织形式,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是防止民间纠纷的激化,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道防线。

(二) 控制性措施:建立严密的犯罪控制体系

采用自我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的模式。自我控制,即做好自身的被害预防,减少犯罪的条件和机会。每位城市居民都有被害的可能,因此,每位城市居民都应注意学习和积累预防被害的知识和技能,遇事后可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发现案情立即报案,保护案件现场,提供案件线索,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社会控制,即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控制犯罪。

首先,建立奖励机制与严密的保护措施,鼓励人民群众协助公安机关查破刑事案件,出庭作证,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其次,组织群众进行治安联防,使联防工作系统化、制度化。对公共复杂场所,如车站、码头、公共汽车等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对犯罪的多发区,如商业区之间、城郊偏僻地带、水陆结合部等地方进行集中联防。最后,积极发展社区化的防控力量和防控措施,尤其应该积极发展各类社区辅警力量和辅警组织。例如,建立健全群众性的社区治安保卫委员会和社区治安联防队,承担社区治安,预防、发现、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了解和掌握社区治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等项任务。社区治安联防队可由志愿者组成,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就业岗位吸收部分下岗失业职工组成。社区治安联防队应严格控制于法律的范围内行动,并由法律对此作出专门的规范,防止借联防为口号,演变成社区暴力,分割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违背群防群治制度设立的初衷。

(三) 改造性措施:建立社会矫正系统

在公安机关、劳动部门、妇联、青年团等有关组织配合下,以社区为基础,建立社会矫正系统。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or)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社区矫正通过对罪犯的区别对待,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者,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包括帮教小组,工读学校等,充分利用社

会各种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增强刑罚效能;同时,社区矫正也为罪犯创造极为宽松的改造环境,如社区服务、社区劳动等,解除了高墙电网的束缚,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罪犯与社会的密切交往,减少与社会的脱节,使其不再排斥社会、仇视社会;并提供社区培训,社区联系工作等服务,为罪犯从“监狱人”向“社会人”转变创造过渡条件,帮助他们提高回归社会的适应能力。

参考文献:

1. 参见(日)依藤滋·城市与犯罪,群众出版社,1988年3月。
2. 陈兴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 (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04。
4.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所·广东闲散未成年人犯罪调查报告·载于南方青少年研究,2002.1,第9页。
5.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6. 张甘妹:刑事政策,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12页)。
7. 江伟人:社会转型期重新犯罪的综合治理,社会,2004年8月。
8. 参见唐忠新:中国城市犯罪防控社区化初探,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三期。
9. 冯殿美、韩建祥:社区矫正:刑事政策学的诠释一兼论对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反思,犯罪研究,2004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黎熙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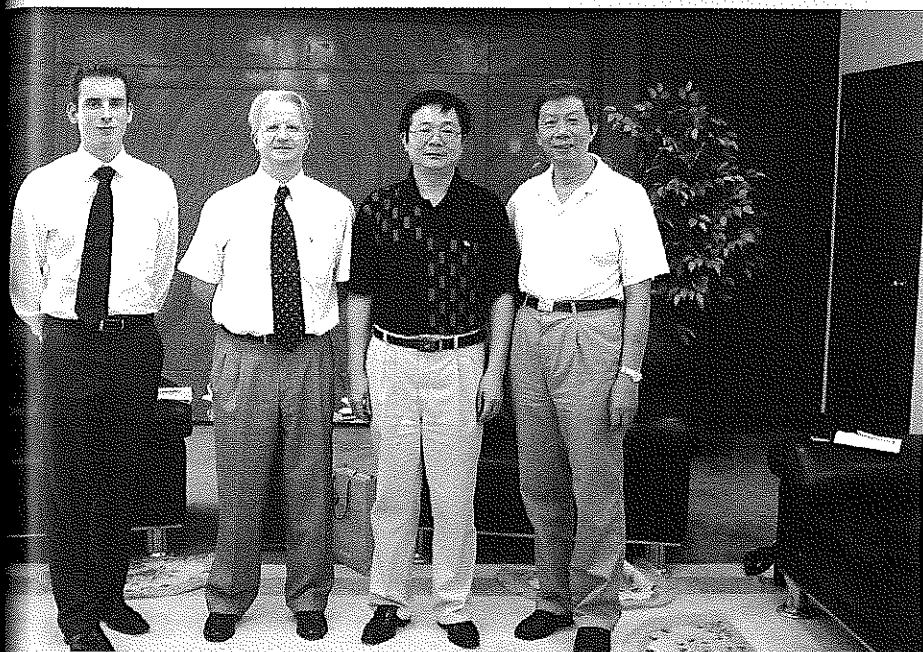
简 讯

2005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香港大学地质地理系的薛凤旋教授应邀来我校为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和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的师生们作了题为: “香港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 的学术报告, 50 多位师生聆听了薛凤旋教授精彩的学术报告, 薛教授在报告后还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若干热点问题。

2005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由中央人民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研究室副主任陈以正、经济部副部长谭艳娟带领的访问团一行 6 人访问了本中心, 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周运源教授、陈丽君教授、郑佩玉教授、雷强教授、袁持平副教授、黎熙元副教授、毛艳华副教授等人与来访客人进行了座谈, 双方就澳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及法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地交流并交换了意见, 同时就今后加强联系与合作取得了共识。

2005 年 11 月 24 日 - 25 日, 由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主办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澳门定位调整》学术研讨会在澳门召开,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应邀与来自香港、广州、深圳、广西、贵州、湖南、四川、福建、云南及海南等地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陈广汉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题为 “澳门博彩业发展与产业适度多元化” 的学术报告。

2005年9月，我校老教授合唱团赴香港参加《中国抗战声乐史诗——不屈的中华》大型联合演出。该团成员于香港大会堂与张汝钧、丁家琳、刘孝扬三位指挥家合影。



2005年7月，法国驻广州总领事卜来世（左二）与领事馆经济社会研究负责人王乐吾（左一）访问本中心。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右二）、郑天祥教授（右一）会见来宾。

2005年10月，本中心陈广汉教授、郑佩玉教授、雷强教授、周运源教授应邀出席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05年11月7日，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雷鼎鸣来我校作学术报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